

研讨实录

第 149 期

149

从戈尔巴乔夫逝世，谈苏联 / 俄罗斯政经体制的演变与影响
座谈会：美国通胀的成因、演变及其对我国的影响
郑秉文：我国人口老龄化态势及养老保险政策的变化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
Shanghai Development Research Foundation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龙华东路917号807室 Address: Rm 807, 917 Longhua East Road, Shanghai
邮编：200023 ZipCode: 200023
电话：86-21-62188752 Tel: 86-21-62188752
传真：86-21-62188714 Fax: 86-21-62188714
网址：www.sdrf.org.cn WebSite: www.sdrf.org.cn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编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

序 言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成立于1993年，是一个围绕发展问题进行政策性研究的非赢利的公益组织，旨在推动改革开放、服务实体经济。基金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组织各种公开或闭门的研讨会，为各方面的研究成果和政策见解提供交流的平台。

基金会每月举办一次“上海发展沙龙”，邀请国内外知名的学者、专家和实业界人士进行演讲，并与听众交流。沙龙已成为基金会有一个品牌。

基金会不定期地举办小范围的“中国经济的未来”系列座谈会，主要关注中国中长期发展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根据不同主题，鼓励不同观点的交流，提倡讨论和争辩。

基金会在每年的年中和年末举办两次“宏观经济论坛”，分析全球经济对中国的影响，判断我国当年的经济形势，展望来年的经济走势。

基金会每年与其他机构合办“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城市化”专题圆桌讨论会，针对城市化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基金会每年还与其他机构合办“上海货币论坛”，对货币问题进行研讨。

基金会每年举办“上海全球金融论坛”大型国际研讨会，邀请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对全球经济、金融进行研讨，这也已成为基金会有一个品牌。

我们把上述各类研讨活动的主要内容进行整理，编辑成册，称为“研讨实录”，不定期发行。在此过程中，我们尽量将研讨活动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将有价值的见解与朋友们分享。希望各位朋友能够给我们提出更多更好的建议，以使基金会举办的研讨活动能够更上层楼！

是为序。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荣誉会长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consisting of three characters: '陈', '震', and '正'. The characters are written in a cursive, flowing style.

编者的话

本期《研讨实录》收录了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最近三次学术活动的实录。

9月8日，基金会和上海市外商投资协会合办了第172期上海发展沙龙“从戈尔巴乔夫逝世，谈苏联/俄罗斯政经体制的演变与影响”。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主任冯玉军和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杨成分别演讲，并回答了听众的问题，研讨会由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乔依德主持。冯玉军先生认为，总体上来讲，在普京执政20多年以后，俄罗斯正在重回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停滞阶段，而且在俄乌战争冲击之下，俄罗斯在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体系中的地位未来可能会进一步下降和边缘化，未来俄罗斯的前景是非常令人忧虑的。杨成先生认为，俄罗斯可能再也不能利用它特殊的所谓帝国的韧性，一次又一次东山再起，这一次它真的已经落后于时代，思想上是如此，资源上是如此，组织上是如此，可能再也回不到真正的大国第一方阵。所以，“普京的长久国家”是不会出现的，将来一定被另一种新模式替代，只是我们不清楚这种模式到底是怎样的，但是肯定和普京的这套方式在大方向上是相反的。

10月14日基金会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上海分中心共同举办了座谈会“美国通胀的成因、演变及其对我国的影

响”。座谈会以下问题进行了探讨：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是否有效？全球高通货膨胀结果会如何？是走向衰退，还是引起金融危机，或者是多种危机并存？这对我国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该如何应对？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王战，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中金研究院执行院长彭文生，兴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王涵，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宋国友，银科控股首席经济学家兼金融研究院院长夏春，上海国经中心副理事长徐明棋等参加讨论，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乔依德主持会议。

10月21日基金会和上海市外商投资协会合办了第173期上海发展沙龙。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先生在沙龙上作了题为“我国人口老龄化态势及养老保险政策的变化”的演讲。他指出我国的老齡化有四个特征：发展速度快，出生率急剧下降，赡养率变化特别快，空间分布严重失衡。他指出，全世界在老齡化面前，所有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都将面临两个时点，或早或晚都要来临。一个时点是当期的收入和支出出现逆转。第二个时点是基金的余额枯竭。现收现付制的两个时点在所有的国家都不可避免。问题是怎么应对，应对以后能够延迟多长时间。他认为，中国养老金改革的方式、路径，要实现两个转变，即从人口红利向资本红利转变，从负债型的支柱向资产型的支柱转变。转变的过程中有一些困难，这些困难需要我们群策群力，不能有部门利益，否则改革就不会成功。

更为详细的精彩内容，请大家阅读本期《研讨实录》。

乔依德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十八日

目 录

从戈尔巴乔夫逝世，谈苏联 / 俄罗斯政经体制的演变与影响.....	1
美国通胀的成因、演变及其对我国的影响.....	30
我国人口老龄化态势及养老保险政策的变化.....	68

从戈尔巴乔夫逝世， 谈苏联 / 俄罗斯政经体制的演变与影响

冯玉军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主任

杨成

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

上海发展沙龙第 172 期 2022 年 9 月 8 日

乔依德（主持人，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主任冯玉军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杨成教授，都是研究俄罗斯问题的著名专家，作过多次演讲，我就看过他们在香港凤凰卫视上的一个对谈。这次，我们邀请到他们，从最近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事情，就是苏联前总统戈尔巴乔夫的逝世，谈苏联 / 俄罗斯政治经济体制演变，以及这些演变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对中国的影响。下面我们就请两位老师每人先讲 25 分钟，然后留点时间给大家提问，首先，我们欢迎冯玉军教授给我们做演讲，大家欢迎。

冯玉军（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主任）：谢谢乔老师的邀请，非常高兴能参加今天的活动，把我一些简单的想法向大家汇报一下。我们都知道

前不久戈尔巴乔夫去世，享年 91 岁，世界上对他的评价众说纷纭，特别是国内对戈尔巴乔夫的负面评价较多。但是我个人认为，无论怎么样，戈尔巴乔夫还是一个世界级的政治家，他执掌苏联政权的那些年，无论是在国内政治、经济上的改革，还是采取的对外政策，都对世界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对 20 世纪末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戈尔巴乔夫从 1985 年执掌苏联政权，到 1991 年苏联解体，大概不到 6 年的时间，这六年可以说是苏联 70 年历史上至关重要的阶段。他所推行的改革与新思维，让苏联国家的发展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人认为，原来很多人心目中可以和美国平起平坐的世界超级大国，在戈尔巴乔夫的手里边轰然倒塌。中国很多人也在讲，戈尔巴乔夫是社会主义的叛徒，甚至说他是美国的第五纵队等。但是，我觉得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本身不是他个人异想天开的行为，苏联整个的国家命运也不是戈尔巴乔夫一个人能够决定的，个人的决定论、叛徒论等都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观。历史的发展是由多种合力共同构造的，个人在里面当然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但是认为戈尔巴乔夫一手导致了苏联的解体，我觉得是与事实相违背的。实际上，他所推行的这种改革，是在苏联 60 多年发展过程中积累的各种矛盾的背景下，在苏联既有的僵化体制已经难以为继的情况下，被迫采取的措施。这种措施从一开始的目的，无论是从戈尔巴乔夫本人，还是从整个苏共中央来看，整个的出发点还是要让已经僵化的体制能够焕发出更多的活力，能够克服原来日积月累的矛

盾，能够维持一个联盟国家，让社会主义焕发出新的生机，同时也要维护苏联作为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地位，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在改革的过程中，其实也遇到了很多困难，各种力量都在激烈博弈，一旦改革，就会触动既有的权力结构，既有的利益分配结构，当然也会引发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政治力量的反对。所以改革不是从一开始就有一个非常好的顶层设计，然后按部就班去推动的结果，其实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改革的初衷、目的和手段都在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调整。从根本上来讲，我个人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在苏联建立起一个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变斯大林体制以及勃列日涅夫长期执政形成的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弊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学说和原理，让社会主义能够推进人的解放，是他改革的根本目的和最终归宿。

在政治领域改革过程中，戈尔巴乔夫逐渐强调改变苏共权力过于集中的现实。一方面，权力过于集中；另一方面，无法充分行使手中的权力。权力不受监督，引发了很多的贪污腐败，包括长官意志、官僚机制不断膨胀的弊端。因此要逐渐把权力从苏共转向苏维埃，让更多的社会阶层和群体参与到国家的决策里。为了实现这些改革，戈尔巴乔夫在这五六年间采取了非常重要的政策，就是“公开性”政策，苏联时期似乎所有的政治、经济决策都是国家机密。他试图改变一小撮人掌握政策的过于封闭的状况，想要更多的社会公民参与，从而发挥社会所有阶层的力量来共同改善国家治

理。当时，前几十年过于封闭、保守的执政方式得以改变，进行了大量对社会和历史问题的讨论和反思，苏联社会确实在一段时间里改变了万马齐喑的状况，苏联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被极大调动起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社会死气沉沉的局面。我觉得这是他政治改革的一个手段。

在经济上，戈尔巴乔夫的主要指导思想，是要改变原来苏联计划经济长期推行的产权高度集中的状况，改变由于缺乏有效的利益分配激励机制和产权不明晰导致的经济长期停滞，经济结构越来越畸形的状况。他更倾向于采用混合经济，即在保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更多发挥集体所有制和一定程度上的私人经济的混合经济，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在走第三条道路。

在外交上，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法，就是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在这个口号的倡导下，苏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勃列日涅夫时期为与美国在全球争霸，把国家很多的资源用于军备竞赛的做法。他改善与美国和西方的关系，一定程度上放松对社会主义阵营特别是东欧国家的控制，并通过减少在第三世界中间地带与美国的争霸，特别是通过停止阿富汗战争来摆脱全球争霸给苏联带来的包袱。更为重要的是，苏联在军备竞赛领域和美国达成了一系列双边军备裁减条约，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当时非常紧张的国际局势。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也为东欧其他国家推行国内改革提供了相应的条件。

总体而言，我个人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执政几年，无

论是对苏联本国还是对全球全人类来讲，都是功大于过的。一方面，他在很大程度上结束了苏联当时过于集权的政治体制，包括斯大林主义下的高度压制、大清洗等，让苏联民众获得了长期难以得到的宽松度；另一方面，他终止了人类面临的核战争风险，给世界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可以说，没有苏联解体，就很难讲之后的全球化进程。苏联解体之后的 20 多年，全球化给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民众带来了普遍性的福祉提高。对于中国来讲，正是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开启了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实现了中苏关系的正常化。苏联的解体，使中国失去了一个最重要、最危险的国家安全威胁。恰恰由于苏联解体，我们才可以把主要精力和资源用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方面，否则我们很有可能在很长一段时期里继续深挖洞、广积粮，不得不应对北边巨大的安全威胁。总体上来讲，我们还是应该给予戈尔巴乔夫更多公正的评价。

从戈尔巴乔夫下台，从苏联解体到现在，俄罗斯经过了 30 多年的转型进程。总体上来讲，转型的进程没有实现转型之初的梦想，整个转型进程是被终止的，而且某种程度上在走回头路。我从两个阶段阐述，一个是叶利钦时期，一个是普京时期。

叶利钦时期，在经历了一个短暂的双头政权之后，叶利钦通过 1993 年的炮打白宫，确立了俄罗斯宪法。1993 年宪法可以说为当代俄罗斯的宪政提供了一个根本性的保障。在这部宪法之下，俄罗斯建立起超级总统制下的三权分立，

尽管俄罗斯总统拥有相当多的权力，甚至比法国的半总统制更加集权，但是加上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权利的平衡在这部宪法里基本上得到保障。与此同时，在叶利钦执政时期，俄罗斯的多党制也得到了比较好的贯彻，特别是 1996 年总统选举的时候，当时的俄共对叶利钦形成了非常强有力的冲击，不同政党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与此同时，非常重要的联邦制也得到了比较好的贯彻。在 1993 年宪法的指导下，联邦中央和各个联邦主体确立了分权的机制，甚至很多共和国都有自己的宪法，权力是相当大的。那个时候，一方面有车臣的分离主义，另一方面有鞑靼斯坦和中央的博弈和分权。可以说那时候的联邦制，基本上是符合真正联邦制的定义的，当然也带来了很多问题，一些地区的分离主义在特定的政治经济条件下有所上升，在车臣和北高加索都表现得非常明显。

在经济上，叶利钦执政时期，特别是在前期推行的私有化进程，用私有化债券在短短的时间内，打破了苏联 70 年非常僵硬的公有制经济结构，短时间内实现了整个社会和国家经济转型，确立起比较明晰的产权结构和产权制度，为后来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奠定了非常清晰的产权基础。但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在取得成绩的同时，过于激烈的私有化也带来了相应的负面影响，导致了一定程度经济上的混乱，而且后来私有化在很大程度上也扭曲变形，并没有实现全民的共同富裕。当时很多的资产被红色资本家、寡头掌握到了自己手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寡头经济，甚至七大寡头在

1996 年总统选举时强烈干涉选举、干涉政治，造成严重的负面效果。可以说，任何一个国家的转型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都会在取得成绩的同时存在很多负面因素，这是我们应该看到的。另外，在叶利钦执政时期，俄罗斯的公民社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原来苏联基本上没有公民权力的状况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扭转，社会公众参与政治和经济决策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保障。当然，这也造成社会上出现很多不同的声音，在有些人看来这就形成了社会上的混乱，当然不同人有不同观点。从外交上看，叶利钦时期其实也经历了一个变化，从最初全面融入西方，到后来发现融入西方没有实现既定目标后，俄罗斯又回头来要保障自己的独立地位，特别是在普里马科夫又提出多极化的构想等。

然后是普京时期。普京从 2000 年执政到现在，已经有 22 年时间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

第一，超级总统制进一步巩固和强化。原来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间的相互平衡基本上已不复存在，可以说国家所有的政治经济权力基本上已经被掌握在总统和他身边一些人的手里，掌握在总统办公厅的手里，议会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又成为了一个橡皮图章，在决策当中发挥不了什么关键性作用。在这个过程中，苏联时期一个非常重要的体制死灰复燃——在整个俄罗斯国家的运转里，总统办公厅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现在俄罗斯总统办公厅的办公所在地恰恰在原来的苏共中央总部，这是一个非常引人关注的现象。俄罗斯现在的决策更多集中在普京和他身边的人，集中在非

常有限的一个小集团手里，这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已经恢复到了斯大林执政末年的状况。所以说，无论是 2014 年的克里米亚危机，还是这次的出兵乌克兰，很多政治人物实际上根本不知道，恰恰是普京和他身边的一些人决定了这些至关重要的事情。

第二，多党制已经形同虚设。现在的统一俄罗斯党被称为“政权党”，也可以称为官僚党，其实都是既有的掌权官僚，他们以政党的形式掌握政权。其他的一些政党说实话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收买，基本上是国家给他们拨款，他们不大会像美国的政党那样去筹款，这些政党的领导人或其他机构的高官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体制内的反对派，真正的反对派基本上已经被打掉了。俄罗斯无论是现在的纳瓦利内，还是原来比较有影响的反对派领导人，要么被暗杀，要么被投入了大牢，多党制基本上已经形同虚设了。曾经在叶利钦时期有所发展的联邦制也不复存在了，通过一系列宪法性法律的修改，包括通过实行中央和地方财政的统筹统支、转移支付等，在普京的领导下，俄罗斯又重新成为了一个单一制的中央集权国家。

在经济上，普京执政 20 多年时间里一个最根本的变化，就是俄罗斯很多主要的经济资源，重新掌握在普京身边的一批寡头手里。如果说普京在刚上台时打掉了一帮老寡头，在他执政的 20 多年里又形成了一批新寡头，而且他们对于国家政治经济资源的垄断远比比叶利钦时期的那些寡头更加集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现象。与此同时，出现了

公民社会的全面倒退。

在对外政策上，普京执政 20 多年也有比较明显的变化。普京执政之初非常希望融入西方，确实也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俄罗斯被吸纳进了八国集团，成为了巴黎俱乐部和伦敦俱乐部的成员，而且俄罗斯和欧盟要建立四个统一空间（经济、自由与法制、外部安全和科教），当时还是取得了较多进展。但是后来又发生了很多变化，从 2008 年俄格战争到 2014 年克里米亚危机，再到今天的俄乌战争，我们都看到，现在俄罗斯和西方的关系已经倒退到冷战结束以来的低点，俄罗斯又在试图重新建立一个小的俄罗斯帝国。

我认为，社会变化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就是普京执政这些年来倡导的所谓保守主义、爱国主义、东正教传统、强国意识等，他以这套东西作为自己主流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普京执政以来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俄罗斯整个社会的思潮在倒退，在向回转。普京所谓的保守主义，不过是原来俄罗斯的斯拉夫思想、地缘政治思想、生存空间理论、帝国观念和弥赛亚思想等这些 18、19 世纪陈旧思想的重新回潮而已。也就是说，在转型的这 30 多年里，俄罗斯社会的思潮没有实现一个质的更新，没有在全球化浪潮里寻找到真正的新的民主思想，而是不得不借用原来的那些陈芝麻烂谷子，重新包装以后作为维护他们权力和维护俄罗斯政治稳定的一个意识形态工具罢了。我觉得对俄罗斯来讲，这方面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我国国内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总体上来讲，在普京执政 20 多年以后，俄罗斯正在重

回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停滞阶段，而且在俄乌战争冲击之下，俄罗斯在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体系中的地位未来可能会进一步下降和边缘化，未来俄罗斯的前景是非常令人忧虑的。俄罗斯历史上多次因为对外战争失败，引发了国内颠覆性的变化：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引发了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1904年日俄战争失败引发了1905年的革命，一战的失利又引发了俄罗斯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这次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中的失利，有可能成为当代俄罗斯历史发展的一个根本性的转折点。究竟向什么方向演化，我个人也没有非常清晰的判断，但是我认为，现在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关头，俄罗斯面临着山雨欲来，黑云压头的大转折关头。总体来讲，俄罗斯这30年的转折，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怎么样处理好制度转型、思想文化更新和人的换代的问题，但是非常遗憾，俄罗斯没有解决得很好。我就汇报到这里。

乔依德：非常感谢冯教授的精彩演讲，我听了以后很受启发。他一开始比较简单地对戈尔巴乔夫做了点评，简单一句话就是功大于过，可能与国内一部分自媒体的说法不一样，我觉得他讲的很清楚。同时，他描述了戈尔巴乔夫想完成什么，做到了什么，没有做到什么。然后讲叶利钦一些政策的特点，最后讲述普京将近20年执政的一些体制上的变化。我觉得他的思路非常清晰，结尾也印象很深，讲到俄罗斯几次对外战争失败都对国内体制有很大冲击。那么就这一次到底怎么样，咱们拭目以待。

下面我们热烈欢迎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上海全球治理

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杨成先生给我们做演讲。

杨成（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谢谢乔老师。玉军刚才做了非常详尽的分析，我就没有必要用同样的思路来讲了。我提几个想法：

第一个方面，关于苏联解体的问题，其中必然涉及到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总体上来讲，我同意玉军认为戈尔巴乔夫功大于过的思路，这是国内主流的意见。苏联解体 20 多年时，吴大辉教授在给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讲课时说过，很多问题在他看来，不光是不够学术的问题，而且有悖于常识的问题，其中就涉及到戈尔巴乔夫是不是叛徒。学术史上，已经有学者证实或证伪了，当初所传的关于戈尔巴乔夫在土耳其演讲的一份材料实际上是伪造的。

苏联解体的原因有很多种，内因说、外因说、先天不足说。比如列宁主义建国的原则，包括民族政策，普京在 2 月 21 日承认顿涅茨克、卢甘斯克独立的时候，实际上也批评了苏共领导人，首先批评的就是列宁。有一种观点认为，苏联解体的很大原因是它先天的不足，体现在以往任何一个政治形态，或人类发展形态的变化，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都是一种自然演化的结果，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发展自然而然的一种演化。但是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一国先建成，然后再向世界扩展，这个过程是一个人为设计的过程。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学术有一个理论，有一个假定，然后再付诸实践，在这个过程中，自然可

能有设想不到的种种意外情况。马克思也没有想过，先是在俄国这样一个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脆弱的、相对发展程度最不足的这样一个国家先发生了，这是先天不足是一种说法。还有很多种说法。现有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缺乏两个因素的考虑，一个重要因素是社会向度。我们现有能看到的基本上是一个结构史的解释，这种结构史的解释往往是自上而下的，无论是强调戈尔巴乔夫的叛变，还是苏联高层集体的转向，集体地背离马列主义原则，放弃共产主义理想，还是其他的民族因素的纳入等，都是自上而下的视角。这套制度在社会这个层面上，到底是怎么被接受的，又是怎么被扬弃的？

这让我想到一个问题点，来自于美国人类学家约尔·查克，他写过一本书《苏联的最后一代》(Alexei Yurchak 《Everything Was Forever, Until It Was No More: The Last Soviet Generation》)，这本书的内容是利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独立初期，那样一个非常开放的环境，他去做了大量调查，做了大量笔记，然后根据这个笔记再提炼。这本书里有一个非常有穿透力的解释，就是认为意识形态有两种功能，一种是表达功能，一种是表演功能，我觉得这个非常关键。他区分了这两种功能，他问全苏联的人怎么看苏联解体，所有人给他的回答几乎是一致的，第一是感觉非常意外，第二又认为这个体制必然要灭亡，必然要衰败，这两者有一定的矛盾，但是偏偏在新独立的俄罗斯里这种表达很常见。最后找到意识形态的解释，即意识形态本来有表达功能，这种表达往往是它的批判功能，就是意识形态可以与时俱进，根据

形势的发展进行调整，这种调整一定带动社会方面的进步，包括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赫鲁晓夫以后，尤其是进入勃列日涅夫时期，就开始现在通常所理解的僵滞、停滞的状态。这个时候，意识形态基本上沦为一种话语，一种表达，都把它当做一种套路去表达，一整套一整套的修辞。那本书里描述这样的场景，一个年轻一点的干部，一个年长一点的干部，他们是同乡，年轻人请教年长的一位，为什么讲那些话语，我看下来是不明觉厉，每个词我都认识，组合在一块好像不认识。对方说，你不需要认识，你不需要真正理解，你照着办就行了。所以，越到后来，越沦为一种表演，一种形式，大家都在喊口号，口号喊的很响，实际上并没有真正信任这个东西，信仰开始崩塌。

现在回头去看苏联的社会，当把社会因素这个向度引进来之后，有很多不同的观察，包括苏联晚期的时候，怎么样由一场粮食危机引发大家对于腐败的不满，对于特权的不满，最终引发了对政权的不满。苏联的城市化运动到了1960-1970年代开始结束。城市化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从农村里抽离出来的人口进入城市要解决就业、住房等一系列问题。出生在1930年代的人，他们自己或者亲身经历过，或者听长辈讲过沙俄是如何如何坏，社会主义苏联是如何如何好，这种新旧体制的比较，在这一代人身上可能还有作用。到了1960年这代人身上开始失效，新的这一代人不看苏联共产党到底做了哪些好事，不看历史的功绩，他们看你还有什么没有做到，这就导入了相当大的反弹，这个因素

我们应该纳入进去。也就是说，把社会因素纳入后，苏联解体就从自下而上的视角，变成一个老百姓到底认可不认可，认同不认同，接受不接受这个体制的问题，实际上最后是被老百姓抛弃了。八一九政变，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动逼宫。事实上在此之前，老百姓还有部分想要维持联盟，因为当年全民公决是支持保留联盟体制的，要改革体制，要新的联盟条约。但越到后面，这样的认同越被消解掉了。最后实际上的核心意思是什么呢？戈尔巴乔夫本人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不能说他毫无责任，但是实际上他是无数次尝试挽救的，甚至在八一九政变之后，在叶利钦他们已经占领上风后，他还试图维持联盟框架，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他是太天真了。

我转述一个故事。浙江大学赵鼎新教授，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终身教授，2019年在浙大开会的时候他跟我交流，特别有意思。他讲在美国，他刚从昆虫学转到社会学领域，那时候刚好是《新思维》这本书出版，洛阳纸贵，大家都在谈，政治学家在谈，历史学家在谈，不同的学者都在谈这些问题。所以他就找来这本书，他看了之后说，这个人肯定不行，苏联最后可能这个体制保不住。他核心的推理是什么？戈尔巴乔夫这个人太天真了，他不从国家利益角度出发，开口闭口都是全人类的利益，在非常残酷的国际环境中会遭到失败。最后，他的观察是对的。但是我觉得，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讲，肯定有他看起来很天真的一面，但是对于西方国家来讲，对整个全世界来讲，尤其对中国来讲，苏联的解体是一件大好事。也就是说，苏联解体只是对俄罗

斯，对普京，对这些民族主义精英而言，是 20 世纪最大的灾难。但是对世界而言，如果没有苏联解体，可能还是半球化，不会有全球化，而没有全球化就没有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没有中国在北方这样一个强大威胁的消失，我们还能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吗？至少从中国来讲，我觉得对戈尔巴乔夫的判断要一分为二，不能单一的去看待。

还有一个因素，除了社会自上而下的因素，我还想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两人的一些共同点和差异点去谈一谈。他们两个都是 1931 年出生的，生日只差 29 天，都出生于内陆省份的农民家庭，都是俄罗斯族。发展轨迹也差不多，都是从地方行政系统起步。戈尔巴乔夫是从政工系统，从共青团开始干起；叶利钦更多从企业，从建筑业干起。他们都有生命中的贵人，都得到了上级的越级提拔，都是从地方提拔到中央。但是他们有一个不同的背景，从家庭出身来讲，一个是贫下中农，一个是所谓的富农，叶利钦的祖父是受到过镇压的，叶利钦本人也被发配到当时的布拉格劳改局劳改过三年。戈尔巴乔夫 20 岁出头就入党，叶利钦差不多晚了 10 年，戈尔巴乔夫在 21 岁时就是党员，叶利钦在 30 岁时才正式加入共产党，但是后来他赶得很快。还有一些偶然因素，他们到中央工作之后，戈尔巴乔夫后来当了总书记。叶利钦相对而言，尽管脾气暴躁一点，但是亲和力还行，很容易组织圈子，跟戈尔巴乔夫派系是有一些矛盾的，没有得到重用。到 1986-1987 年，叶利钦迅速倒向另外一面，就是要跟戈尔巴乔夫对着干了。1987 年，他曾经给戈尔巴乔夫

写过一封辞职信，戈尔巴乔夫没有批准，也没有任何回应。叶利钦就非常生气，他去大闹中央委员会，戈尔巴乔夫很生气，组织集体批斗他，把他的莫斯科市委书记拿掉了，给了建设部长这样一个虚衔。叶利钦一度很抑郁，曾经想过自杀，也住院治疗过，向戈尔巴乔夫提出要到古巴当大使，但是没有批准。如果他被批准出外当大使，可能情况就不一样了。这也是我想讲的，苏联解体有很当偶然的因素，尽管这种偶然因素是在一些结构性因素的必然性之下，可能不在这个点上爆发，就会在另外一个点上爆发。不管怎么说，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这种个人恩怨，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第二个方面，从历史长视角去看，我们看转型的时候，还不能仅仅从戈尔巴乔夫开始讲起，如果把时间再拉长一些，会发现从苏联时期开始，甚至从沙俄时期开始，就已经出现了改革、革命、保守的周期性循环。改革与反改革的周期一直在循环，像一个钟摆一样，不停来回回荡。甚至有人开玩笑讲，从苏联领导人和俄国领导人的发型上都看得出来，一直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的：列宁没头发，斯大林有头发，再往下看，都是有头发和没头发，但是这更多是一个巧合。总的来说，列宁的政策被斯大林推翻了，赫鲁晓夫把斯大林赶下神坛，勃列日涅夫实际上又对赫鲁晓夫的改革政策实行逆转，重新回到相对的保守路线上来，后面的安德罗波夫想改革，契尔年科想要重新回到勃列日涅夫主义上来，戈尔巴乔夫当然搞改革，最终葬送了苏联。普京呢，普京形式上尊重了叶利钦，给了他个人以及家庭这样的安全，

但是在政策上可以看成是一种逆反，一种逆转。所以，这样一种改革反改革的周期循环始终存在。

从更大的周期上来看，从彼得大帝学习西方为界，向西方和向东方，可以看出这样的一个月期。从更广泛意义上来讲，今天之所以会出现普京时期重回类似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停滞状态，刚才玉军已经从超级总统制，从社会，从思想等各方面都做了详尽介绍。实际上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回归俄罗斯传统，这个传统源于历史上的一种路径依赖。俄国曾经遇到过几次观念的转折点，路径依赖不一定是正式制度，路径依赖往往是非正式的，存在于基因里，存在于文化里，作为思潮，深入骨髓，很难改变，相当于一种潜规则，长期影响着俄国的思维。俄罗斯过去第一次机会，是诺夫哥罗德和莫斯科公国两种模式的竞争，诺夫哥罗德比同期西方的政治组织形态更先进一些，它是汉萨同盟的必经之地，如果当时按照那种方式的话，俄罗斯可能在真正意义上能够成为西方，成为欧洲文明的一个重要代表。可惜的是，莫斯科公国最终把诺夫哥罗德战胜了，消灭了，从此这条路径就没有了。二月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其实也是一次机会，但是后来布尔什维克取胜了。后苏联时期，尤其在90年代，自由主义这批人，无论是官员还是学者，很大程度上认为苏联走了一次歪路，他们要重新把俄国的传统结合起来，重新续上。再往后，苏联解体本身也是一次重要的机会，1993年宪法是非常关键的时间节点。

1993年宪法是用暴力的形式实现的，像亨廷顿在《变

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书里强调的，一些国家如果想要推进改革，必须要有一个稳定强大的中央权力，如果没有这样的权力，可能就会有系统性的败坏。当时叶利钦向民众直接要权的时候，给出的理由就是要防止共产主义复辟，防止历史的回潮和倒退。他说，我们刚刚告别革命没有多久，这样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强大的权力，怎么保证不是原来掌握官僚特权的那些人重新回到政治舞台，进行政治压制呢？老百姓最后选择相信他。那时候有一个很好的起点，尽管他要了权，却是有可能在那个时候打破历史路径依赖的，只可惜最后还是没有。叶利钦到了 1994 年，休克疗法结束之后，这一点需要郑重说明一下，国内很多人把叶利钦整个时期看作是休克疗法全部覆盖的时期，这是不准确的，1990 年代初期到 1994 年搞的是休克疗法，1994 年后切尔诺梅尔金重新回来任总理之后，叶利钦已经有所偏离了。叶利钦提出可控民主模式时，已经部分回到俄罗斯老传统，所以他后面选了普京，使这个传统进一步加速回归。我原来的博士论文做了类似的题目，关于第一次转型和第二次转型，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之所以出现这样一种历史路径依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叶利钦时期在打破历史路径依赖之后转型的目标很清晰，是从威权向民主制度过渡，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后来，历史传统的那套因素还会起作用，其中很核心的一条就是被苏联经济学家瓦西里耶夫称为“权力 - 财产权”的模式，即谁占有权力，谁就会有财产权。它和西方的私有制产权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也是为什么普京的很多亲信掌握了国家的经

济命脉，分别在国有或者国家控股的大型企业里担任董事长或领导，背后的原因就是这样的。它很快重新回到了俄国人所熟悉的那套“权力 - 财产权”，回到了它所熟悉的中央集权的权力组织方式，超级总统制只是莫斯科公国权力集中的 21 世纪翻版而已。所以这套东西在不停重复，政治上进一步强化领导，经济上是国家资本主义模式，“权力 - 财产权”进一步稳固，外交上也重新回到了所谓的大国强国外交。在这个意义上来讲，不光是保守主义思潮，而是整个民族主义的情绪。在苏联解体初期，一些人主张建立俄白乌联盟，包括把哈萨克斯坦的北部拿进来。今天普京在白俄罗斯，在乌克兰，在一步一步做的，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外交上、社会上，重新逐渐回到了历史的路径里。

这是一个特殊论和普遍论的角逐，最后俄罗斯回到了特殊论。俄罗斯认为俄罗斯就是欧亚，认为俄罗斯是单独的世界，不和西方一样，不可以拥抱所谓的普世价值。尽管在苏联解体后的 30 来年时间里，他们曾经数次拥抱所谓的普世价值，但是最后还是回到强调俄罗斯特殊道路的这样一个路径。

最后，当我们考虑这些因素的时候，无论是苏联解体的社会向度的因素，还是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的复杂关系，一些偶然的因素，还有历史路径依赖，结合这些来看，至少可以很肯定地下一个结论，对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以及对苏联解体影响的评判才刚刚开始，还没有完全下一个定论。在相当程度上来讲，西方更多的是高度评价戈尔巴乔夫，而

俄罗斯国内对戈尔巴乔夫和对叶利钦的评价是比较低的，当然他们有一个以成败论英雄，以是不是扩张国家领土作为标准。抛开这些，从全人类，包括从中国自己的发展，从各个角度来看，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可能不能一边倒的负面评价。从长远来看，他至少是功过参半，甚至功大于过。所以要有更多的时间去考察戈尔巴乔夫的得与失，戈尔巴乔夫对于世界历史，对于全人类的发展，对于地区局势，包括对于中国的影响。苏联也好，俄国也好，就是中国的一面镜子，给了我们一个参照。以上是我汇报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乔老师的邀请，谢谢。

乔依德：谢谢杨成老师。他从苏联解体的视角，分析苏联 / 俄罗斯的这些演变。特别有趣的是，他提到的赵鼎新也到我们沙龙来讲过。可能有不少人认为戈尔巴乔夫比较幼稚，或者比较书生，就看你怎么讲。怎么评价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过程中的作用，确实有很多争议。非常感谢两位从不同视角给了我们很好的解释。

下面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各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可以向两位老师提出来，也可以写在聊天室里。

赵广彬：我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两位老师讲得特别棒，内容很精彩。两位老师能不能对未来俄罗斯的走向再做一个前瞻性的展望？比如说，普京现在还在执政，普京以后的俄罗斯，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大趋势？

乔依德：这个问题提得很好，要么还是先请冯老师先回答一下。

冯玉军: 其实刚才我已经简单涉及到了。我总体的观点是，不管普京怎么样，俄罗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思想，说实话已经落后于时代的发展了，这是它的一个大问题。这场战争也会让俄罗斯在世界经济中进一步被边缘化。现在我们都看到，特别是在能源领域，原来俄罗斯认为缺了自己就不行，而且现在似乎还没有改变这种看法，但是实际上，世界上不是仅仅俄罗斯有能源，欧洲今年冬天会很难过，但是欧洲现在已经铁了心要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欧洲与俄罗斯相关的很多产业链、供应链在很大程度上都在非常迅速地断裂和重组。现在普京在东方经济论坛上，试图把能源更多地卖给中国，中国会在一定程度上帮他解决一些困难，但是没有办法全面代替欧盟。与此同时，整个俄罗斯的经济基本上还是能源依赖型的，没有什么高科技，而且苏联时期建立起来的整个工业体系仍然在加速衰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国家在整个世界的科技发展、经济竞争中的地位会越来越虚弱。同时，经济虚弱带来的民生的不足，特别是权力核心中的分化，普京身边寡头们利益的不断受损，都会给俄罗斯未来的政治稳定带来非常多的冲击。总体上，我个人预测在不久的将来，俄罗斯会面临非常巨大的转折性变化。是普京下台，还是整个国家进入一个更加艰难的时刻？艰难是肯定的，但是怎样艰难，会不会再次解体等，我就没有办法做出预测了。总体而言，我觉得这个国家已经非常困难了，而且未来的前景也是不看好，会进一步下滑。

杨成: 我觉得是这样的。确实像玉军老师讲的，我们要

给出一个具体的特别明显的精确情境，不大可能。这时候可能还是要借助情境分析，讲几种可能性。第一种，会不会在俄乌战争中俄罗斯完全战败，引发大的政治变化，普京就此下台之类的。目前看起来，还有很大的不确定因素，所以我们不基于这样的事情做很肯定的判断。我觉得可以假定两种情况，一种是普京还可以对现在的体制，在战争的情况下，进行主动地维系和调整；还有一种是可能遇到非常强大的挑战力量。前一种情况下，尽管是在战争状态之下，他没有遇到大的挑战，后一种是其他政治力量对他有挑战，这样两大类不同情景。第一是停滞，这种停滞的现状非常类似于1970-1980年代勃列日涅夫晚期的苏联，现在的体制已经和那个高度相似了，比如外部经济环境差，现代化改革动力不足，资源的诅咒，基本上没有办法通过自我的努力去克服这个难题。第二是腐败问题非常突出，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消解它的正当性和合法性。第三是创新产业非常缺，经济结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这是一个典型的类似于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场景。

还有一种，万一战败了，但是他可能进一步加强对国内的控制，这种情况下出现一个超级可控民主也是有可能的，类似于20年代的苏联。当时苏联面临非常强大的外部和内部压力，就着力寻找外部或内部敌人来巩固政权，这种场景也不能完全排除。到时候在内部找特务，找第五纵队，加强对反对派的压制，对任何不同意识形态的压制，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再一种是搞一个新的调整，就是再来一次转型，这种场景的可能性不太大。另外一种情景是反对派力量因此兴起，对现有体制构成强有力的挑战，可能出现一种类似于美国当年的进步主义运动，会不会出现一种俄罗斯式的进步主义运动呢？这种可能性其实不能完全排除。进步主义运动曾经帮助美国能够更好地克服腐败，打击垄断，提高了国家的治理能力，包括很多公共事业的发展。俄国会不会有？我觉得从历史上，刚才我提到所谓改革发展的周期来看，在每一个新的周期开始时，它一定要清算，这是俄国政治文化非常鲜明的特点，它一定对以前的那个完全否定，然后再重新开始。这种进步主义是一种潜在的前景。

另外一种就是更特殊了。沙俄时期曾经有 12 月党人革命，会不会出现新的 12 月党人革命导致权力更迭？这种可能性，至少从现有的俄乌冲突态势来看，长期战争对国力的消解非常厉害，国内的反对力量正在不断成长起来，只是没有到合适的机会，未来会不会有也很难说。

总之，如果我们再把普京这个因素排除掉，换成一种没有普京的后普京时代，可以肯定的是，按照历史上的钟摆定律，一定有回摆。俄国和我们不太一样，是一种特别的发展类型。我们可能特别强调延续性，我们形式上做到了统一。而俄国在形式上是断裂的，当它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的时候，相当于找了一条中间道路一样，只是这个代价非常巨大。所以后普京时期，我觉得俄国政局肯定不像现在这样。我也非常同意这么一个大的论断：俄罗斯可能再也不能利用

它特殊的所谓帝国的韧性，一次又一次东山再起，这一次它真的已经落后于时代，思想上是如此，资源上是如此，组织上也是如此，可能再也回不到真正的大国第一方阵。我能够看到的一种场景，一定是对普京遗产的一种清算。所以，“普京的长久国家”是不会出现的，将来一定被另一种新模式替代，只是我们不清楚这种模式到底是怎样的，但是肯定和普京的这套方式在大的方向上是相反的。这是我的补充。

乔依德：谢谢两位老师的回答，下面还有人有什么问题吗？

左学金：两位教授做了很好的演讲，我也学到很多东西。我非常赞成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人家说成叛徒，完全以成败论英雄。我赞成两位教授说的，我们可能还是要正面来理解他。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对冯教授的，冯教授在演讲中对叶利钦那个时代给予比较多的肯定，我非常赞成很多说法。我的问题是，叶利钦那个时代，俄罗斯的法制是不是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权力制衡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我记得很清楚，叶利钦炮击议会，这在西方是不可思议的。正因为没有建立一个比较好的法制，在转型过程中就会对俄罗斯后来的发展埋下了一个不好的伏笔。最简单的事实是，外资都不大愿意到俄罗斯去嘛，因为法制的保护太少。当然现在普京走得更远。我对杨教授提个问题，杨教授认为普京政权有可能由于战争或各种原因出现更迭。我想请教一下，万一俄罗斯的政权出现更迭，对中俄关系会发生什么影响？从这个视角来看，从双边关系来说，我们应

该有哪些预案？有哪些可以采取的举措？我是外行，提两个外行的问题。

冯玉军：谢谢左老师的问题，非常专业的。法制是不是在叶利钦时期比较淡薄？我觉得是这样的。在叶利钦时期确实发生了很多的暴力事件，包括他本人动用坦克炮打白宫，炮打议会，这在世界文明史上确实是令人震惊的事件。但与此同时，我觉得叶利钦那个时期，也是整个苏联崩溃以后，在向一个新的国家转型的过程中，用我们主流的话语来讲，是用资本主义法制体系全面代替原来苏联时期法律体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无论是从宪法，还是从民法、刑法等一系列非常重要的基础性法律，包括土地法等，都是在叶利钦时期编纂完成的。可以说这个时期是当代俄罗斯法制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初创阶段。但是，有了法律条文并不意味着就已经是一个法制国家了。制度和文化其实是相辅相成的。俄罗斯在其千年历史上，包括在苏联 70 多年历史上，法律很多，但是我们很难称之为一个真正具有法制精神的国家。无论是从立法者，还是从执法者，包括从普通公民来讲，俄罗斯的法制文化可以说是比较淡漠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世界上确实没有一个非常成功转型的模式，俄罗斯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在建立法制社会、法制国家的过程中，不仅仅要有条文，更重要的是要有这种上上下下，各个层面权力机关到普通老百姓，对于法律的尊重。

杨成：谢谢左老师的问题。中俄关系确实是一个重要

的、我们需要去审视的问题。我们看待俄乌战争，包括普京政权的存续问题，可能都要把它放在一个至关重要的视角去考量。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即便没有现在的俄乌冲突，普京时代总归是要终结的，哪怕是一个长普京时代。俄罗斯在处理对外政策的问题上，基本立场和我们国内现在大量的看法，尤其是官方的定位，大概不是很匹配的。他们的思路更多是处于一个下降期的大国，或者衰落中的大国，更多是基于自身的国家利益，当然不管哪个国家都是从自己的国家利益去考量的。

俄罗斯更倾向于在新的国际环境中，扮演一个类似于中国曾经在中美苏战略三角中扮演的角色。2010年，卡尔加诺夫团队，普京非常信任的一个外围智囊，在上海开会的时候提了一个观点。我们当时是不以为然的，但是回头看的话，这显示了俄罗斯在苏联解体之后，所谓的外交智囊团并没有消解掉苏联遗产的作用。他们对国际大势的总体判断是这样的。第一，21世纪的主要矛盾，将会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模式（他们叫威权资本主义模式）和西方美国为代表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的竞争。第二个结论，即便中国不想卷入这场冲突，美国和西方也会千方百计迫使中国卷入。第三，他们认为俄罗斯处于历史的最好时期，外部没有大的敌人。2009年俄美关系重启，已经忽略了2008年俄罗斯格鲁吉亚战争状态下的紧张，外部没有大的敌人，内部稳定可期。俄罗斯最好的角色是扮演中美之间的平衡手，因为俄国的位置非常重要，它倒向哪一边，胜利的天平就会倒向哪一边。

因此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会竞相争夺俄罗斯的影响，一个颠倒的中美苏战略三角模式就会重新出现。这是他们的一种设想。

2019年在彼得堡经济论坛上，当着习主席的面，普京也讲了坐山观虎斗这样一个话语。普金被记者问到怎么看中美之间的贸易战时，他有这样一句话，当然他随后又有一个往回收的话。但是实际上我相信，前面的那个话才更像他的真心话。他认为，西方总体上在衰落，尤其是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标志着美国已经意识到没有实力同时来打压俄罗斯和中国。因此在这时候，他就可以抬高要价，他提了非常高的要价，即他以中美战略竞争为条件，想要获取俄罗斯在欧洲安全架构上更大的发言权，更大的利益。你能指望他在未来，在中美竞争的情况下，哪怕是换了一个领导人，尤其政权更迭后像我所描述的钟摆回到了另一边，可能变得更加推崇西方路线的时候，还能和中国完全站在一起吗？所以我们今天的很多话语，是要放在历史的语境上去讲的。所谓的“中俄关系上不封顶”是一种语境，“中俄合作没有止境、没有禁区、没有上限”可能又是另外一种语境。我认为这只是一种修辞，其实不是中俄关系的现状，中俄关系也不可能到达这样一个状况。

未来中国和俄罗斯绑得越紧，可能在对外关系上就会越被动。俄乌冲突本身，我们所谓的中立立场已经受到广泛的置疑，已经被美国塑造成专制和民主两种制度之间的对抗。所以其实现状是，中俄关系没有想象的那么好，尽管没有那

么糟糕。可能官方所说的历史最好时期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历史上从来没有相互平等的一个状态，大部分时间里我们是受欺负的，是依附者。实际上这种平等也是形式上的平等，我认为，中国在中俄关系上，很大程度上是被俄国推着走的，它把它的理念转换成了中国的一个理念，中国的一个话语。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在实力上远远超过它，但是在心理上有某种程度上的不对等，我们依附于它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所以中俄关系未来最好的前景，就是正常的国家间的关系，那可能是比较合理的。

现在的这一套，都是一套虚像，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假象，好象俄国是可以依靠的，是中国大后方一样的，互为战略支撑。但是我觉得，真正到了中美战略竞争的时候，俄罗斯不火中取栗就不错了，保持友好中立可能都很难做到。所以对中俄关系的前景，我们可能要做详尽的评估。假定真正出现后普京时代，那种情况下更大的可能是俄罗斯和西方迅速靠拢，而不是和中国更紧密地合作。我们要有预案，怎么预案，我其实也没有完全想好。我是觉得，只要中国能够抓住一条，就是在中美战略竞争长期化、实体化、普遍化的情况下，一定要想办法争取更多的盟友。在这些盟友中，或者不是盟友，叫伙伴吧，可能不光是考虑所谓的非西方国家，发展中国家，新经济体，更主要的是要想办法从发达国家里争取更多的支持。这就要求我们不光是自我克制，而是看我们能不能提出一套理念，能够被全世界更多的接受，所以仅仅讲特殊性是不行的。这个意义上来讲，如果我们这

套话语，这套东西能够被认可，也许是一条出路。但是如果不能，还是我们一种特殊的表达的话，那么中国和世界，尤其是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会持续紧张。中美之间今天的现状已经表明，我们也许以后每一年都会感慨，今年是近年来最好的一年。我就讲这么多，谢谢。

乔依德：谢谢冯老师、杨老师非常精采的回答。时间不知不觉过得很快，已经差不多一个半小时过去了。如果没有更多的问题，我们今天这个活动就到此告一段落了。我觉得，今天的演讲和提问非常有意思，也触及到一些比较深层次的问题，以后还需要继续研讨。我们基金会作为一个非政府、非营利的公益性组织，也愿意在这方面为大家创造一些条件。再次感谢冯教授、杨教授的精采演讲，感谢各位今天晚上参加我们的活动，类似这种活动我们还会继续举办，今天的沙龙就到此结束，感谢大家。

（以上内容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美国通胀的成因、演变及其对我国的影响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上海分中心

系列座谈会第 73 期 2022 年 10 月 14 日

乔依德（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这个座谈会的来源是王战主席觉得最近大家都比较关注通货膨胀的事，后来托徐明棋老师跟我商量，让我们与国经中心在小范围里开个会，大家谈一谈这个事情。所以我很快询问大家，发了通知，大家都答应来。首先是要感谢大家，大家都很忙，现在疫情弄得人心慌慌，不确定因素很多。王战你先说两句吧，把你的想法和大家谈谈。

王战（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最近我们在做二十大前的一些预研究，二十大以后接下来就是经济工作会议，明年既要落实二十大，又要面临很复杂的形势。首先你要把背景搞清楚，国际形势现在这么严峻复杂，我看头号因素就是美国的通胀，我自己对这个问题感到有点吃不透。美联储加息 75 个基点，11 月份还有一个 75 基点。美联储不是不知道美国的溢出效应对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美联储一定分析过利弊。今天开会，请这方面的顶级专家议议看。我不认为它是对通胀一个暂时的判断，它推出来以后回不回去，这也可以是一种分析。但是我想它

一定是有原因的，就是这个问题。

乔依德：王院长讲了他的一些想法，我们发给大家的邀请函中也提到：现在是一个“十字路口”，一个“转折点”。IMF 前两天发了一个报告，下调了对经济的预期，下调的原因各种各样，警告也很多。美联储多次加息（11月初可能还要加75个基点）对通货膨胀是否有影响？对这个也有不同看法，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的人觉得通胀的原因不是需求，主要是供给，加息可能对通胀会压一点，说不定通胀没压下来，把经济压下来了。也有人担心，美国以美元计价的债务很高，这样加息之后，可能债务有问题，会引起全球金融危机。现在又一个新的说法，“多种危机并存”。今天就想听听大家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在对这个做出判断以后，再谈对中国会有什么影响？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措施？这次座谈的人少，第一轮大家发言时间不一定很长，先讲七八分钟，大家谈得深一点，互相之间有问题可以提出来。

彭文生（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中金研究院执行院长）：通胀本质来讲是需求大于供给，这一次和以往有什么差别，是需求升得特别快，还是供给降得比较多，这对经济的含义是不同的。这一次和过去不一样，应该说是全球面临供给冲击，从疫情到俄乌战争，这是一个系列，全球的生产供给受到了影响。我们怎么理解供给冲击的含义？第一个供给冲击是经济衰退，而不是通胀。经济里的一部分生产停顿了，那就是经济下行，就是衰退。之所以体现为通胀，是因为宏观的财政货币政策刺激需求，或者试图帮助社会某一部

分群体，供给冲击首先是来自经济衰退。全球都面临着这样的供给冲击，为什么美国是通胀，中国是经济下行？差别就是中国和美国的宏观政策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差别。

第二个差别，供给冲击意味着供给的价格弹性下降。市场经济怎样实现供求平衡？实际上就是价格。供给少了，价格就上升，价格上升一方面打压需求，一方面刺激更多的生产。但是，现在供给冲击是一些非经济因素，疫情、战争、气候，价格引导的效果是有限的。俄罗斯不给你天然气，价格升得再高，供给也上不来。我们现在的疫情防控措施，封控不让你出去工作，价格升得再高，生产也上不来。因为供给的反应慢了，供给失衡必然更多体现在价格上，所以价格容易走极端，欧洲天然气价格这么高，美元汇率涨得这么厉害，这些都是整个经济供给弹性下降的体现。所以，第一是经济衰退，第二是价格容易走极端。

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怎么理解美国的通胀？美国在供给少的情况下，财政直达消费者，财政给老百姓发钱，一方面生产受到限制，一方面又给老百姓发钱，仍然是通胀问题。对美联储现在的政策紧缩力度，不光美联储太乐观了，市场实也太乐观了，投资者总是抱有期待，美联储是不是可以加息，加一点就够了。这就涉及到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供给冲击。美国要把通胀控制住，经济一定要衰退，经济增长必须下得更多，才能把通胀控制到以前的水平。所以美国的经济衰退是难以避免的。

我们中国的情况不同。刚才我讲供给冲击本身是衰退，

但是它还会外溢到需求。比如说一个餐馆因为封控停业了，餐饮从业人员收入下降了，就会减少其他的消费需求，比如说手机等。在没有政策干预的情况下，源头是供给冲击，但是通过不同部门之间的联系，变为更大的需求下行。我们中国是需求下行的压力更大，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较大。

未来怎么办？美国必须进一步紧缩财政货币，其实主要看财政，今年财政赤字率要降到 5% 以下。但是按照拜登政府现在的一些政策取向，未来几年美国的赤字力度虽然比 2021、2020 年有明显下降，但是和疫情之前比还是明显上升的，民主党各种各样的法案基本上都是增加政府支出的，所以美国控制通胀的任务就压在美联储身上。昨天晚上美国股市涨得挺好，我感觉投资者太乐观了。

我们中国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可能更大。美国有通胀，但是有通胀比没有通胀要好一点。我们现在下行的压力特别大，很多政策实际上已经超越经济了，源头是非经济因素。所以靠经济政策来解决问题，不是说完全不可能，但效率很低，要付出代价很大，因为它本身不是一个经济问题。其实不需要什么经济学理论，这是一个常识，你把人封了，不让人出去，经济怎么能好呢？尤其是小企业，本来有点希望，但一波一波被消灭了。所以，最理想的政策就是要放松。当然我不是公共卫生专家，他们说医疗资源的问题不是那么简单，这个也有道理。但是如果花几千亿天天做核酸，为什么不花几千亿做好医疗准备？为什么不建更多的 ICU？为什么不把基层的医疗资源补上呢？目前看不到任何实在

的准备。我们医药行业的研究员也跟我讲，行业内看不到任何准备。所以这就很悲观了，对小企业的影响特别大，这样搞下去就不是经济问题，而是社会问题了。

王涵（兴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我不是公共卫生专家，但是最起码要使做经济分析和公共卫生研究的人坐在一起，大家要比。疫情确实是一个灾害，不可能有一个完美的办法恢复到过去，肯定要有代价，但是对于社会来讲，公共政策得做出选择，哪方面代价太大了，我们要平衡一下。这是第一优先的，防控政策要优化。

第二，如果这个短期内做不到，次优的政策应该向美国学习，财政直达，就是要给老百姓发钱。你给老百姓发钱，最起码让他们生活有出路。所以财政应该给受影响的群体发钱。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经济政策也有问题，我们是救经济主体，救企业，这在正常情况下可能是对的，但在现在的情况下是不对的。你救的是什么经济主体？疫情演变可能使经济结构发生变化，有一些经济主体就不应该存在了，它就应该消亡。你现在救它，第一是在浪费资源，第二是在阻碍经济结构的调整。更有效地救经济主体，就是让消费者说话，把钱发给消费者，消费者把钱花在什么地方，那就是经济未来发展的方向，这才是真正救经济主体，救企业。所以，应该给消费者发钱，这是次优的。

如果这个也做不到的话，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做不到，反正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我们现在通过各种黄码、红码把每个人的行为限制住，但又说资金不好落实到个人，我无法理

解。这个做不到，就走老路，基建、房地产。问题是这些物理隔离，使得基建也好，房地产也好，出口也好，效应都在大幅度下降。从基建赚钱的人要外溢到其他地方的人，你要把基建力度搞得特别大，把房地产力度搞得特别大，才能达到过去的效果，结果必然是经济有更多的扭曲，房地产搞不好又来一波上行。哪一天我们的疫情真的缓解了，真的逐步恢复正常，可能有比美国更高的通胀。现在贷款发不出去，企业没有信心，企业的钱囤在那。为什么给消费者发钱？投资是看预期的，如果预期能不能赚钱，我再有钱也不能投资。但是消费不一样，有一部分消费是必须的，不是看对未来的预期怎么样，而是有没有钱。我要吃饭，我要穿衣，我要看病，孩子要上学，这些都是必须的。所以给消费者发钱相比给企业钱让它投资，在现在情况的下，给消费者发钱的拉动效应更大。问题是现在给企业这么多钱，它不投资。我们的信贷其实很强，这个钱发出去，经济起不来，一旦经济恢复正常，未来我们的通胀如果比美国还要高，一点都不奇怪。

王战：你这个判断我倒是第一次听到，预期通胀可能比美国都高。

王涵：我就今天这个命题讲讲自己的看法。我觉得我们不能拿和平时期的经济政策来考虑现在的问题，这是一个大的判断。现在三场战争，俄乌这场是热战，疫情是人与天之战以及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制度比较，第三场是中美实际上已经开战了，无非以前开战是派飞机把你的厂炸了，现在是把

你厂要用的芯片全给停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整个政策逻辑一定要是真实的逻辑。

回到刚才讲的通胀问题，中美通胀的潜在推动力不太一样，美国是服务性为主的经济体，它通胀的最大来源是人力成本。疫情之后，美国的整个就业已经比较充分了，但是似乎上了班以后效率并没有真正提高，这跟新冠常态化是有关系的。以前美国在全球化时代，享受了资本相对于劳动力的不正常的高议价能力，美国劳动者不干，有中国劳动者干。现在如果是逆全球化，从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劳动力回报低于资本成本的趋势要逆转，劳动力价格上涨是一个长期趋势，工会力量会恢复。

王战：你这个判断和美国制造业回归，要把台积电、三星弄到美国去有矛盾吗？

王涵：我觉得是有的。我最近看美国战略智库讨论，对所谓美国供应链安全性给出的方案是不一样的。一个讲法是要把产业搬回去；另一个讲法是提升供应链韧性要做三件事，最容易做的是库存管理，第二是要把产业链往盟友那边搬，第三是实在不行再外包。

彭文生：我觉得有两个因素，第一是它不完全算经济帐了，第二是对美国来讲，有一个社会公平的问题，这些产业回流到美国，工资提升，可能资本的回报低了，这也是它的一个选择。

王涵：我们算了一下美国的通胀，明年中期的名义通胀会回到 5% 以下，但是中长期核心通胀中枢在 3% 左右，可

能比以前要高。中国通胀最大的根源是原材料成本、能源。从现在情况来看，至少在过去 12 个月里，我们做的事情是有利于通胀下行的，一是我们并没有死揪着债务上限（政府财政赤字占比 GDP 不得超过 3% 和政府公共债务占比 GDP 不得超过 60%），今年煤电的恢复对我们还是有帮助的。第二，美国以前在全球有红利，用本币可以买它的原油，但是在俄乌战争中有的原油交易部分或者全部用人民币结算。这块到底给我们带来多少能源优势还不知道，但是这明显是外交决定国内的通胀，有这样一个逻辑在。我觉得这两点是未来中美两方通胀的核心矛盾。我们自己估算下来，到明年中期之前，CPI 大幅超过 3 的可能性不大，PPI 在 7、8 月份之前基本上在 0 到 2 这个区间振荡，往后还看不清。

关于美元走强、利率收紧这个事情，我这里有一个阴谋论。如果我们不算经济战，美元升值对打击中国起到两重作用，第一是美元升值的背后是日元、欧元的贬值，相对于中国的汇率优势大幅度提升，这带来中国高端产业往这些盟友搬家的可能，以前我们说的是低端，现在说的是高端。第二，汇率贬值过程对中国的境外整个资产有巨大的影响，今年我们的外汇储备下降，很大一块是因为日元、欧元汇率缩水。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两个冲击，再回过头看它的整个加息过程，美元走强也许打的是组合拳。

王战：你刚才说的是自己的分析，还是美国智库做的解读？

王涵：都有。货币升值的进程怎么会达到一个转折点？

我觉得最近有一些变化。第一，今年货币的升值，二季度让美国净财务缩水 15% 以上，算下来到今年 9 月份，美国前三季度的 GDP 和它的财富缩水差不多，这对它是一个负面影响。第二，最近英国的养老金危机是很大的事。这么长时间的低利率环境，现在看起来这些长期金融机构承担了利率上升的风险，利率上升所涉及到的金融机构，买方也好，卖方也好，是一个连锁的关系，这会不会打断利率上升的趋势？英国是美国的铁杆盟友，这可能是一个变量。第三，中美博弈里，如果美国经济上跟中国脱钩，理论上说美元的使用范围是会收缩的，因为你不可能经济脱钩，美元还在全球使用。它收缩后空出来的这部分国际货币范围，现在看起来是中国在往里填。这对美国来讲，是不是长期战略上的选择，也不好说。

综合来讲，它的整个货币上升带来了好处，但是负面的东西也在出现，后期就看这两方面的权衡。我现在不是说一定会持续加息，一定会让美元升值。中国跟日本欧洲相比较的优势，因为汇率而变化，这是走一步看一步的过程。

宋国友（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关于美国现在的通胀，还有美联储货币政策，我有这样一些看法。

第一，美国的通胀不是单因素推动的。如果通胀是从去年 2 月份开始的话，那时候可以把通胀理解为货币政策放松管制，是货币推动的，当时很多人认为发了很多货币造成通胀。美联储基于这样的判断，不是很着急，那个还是可控

的。但是后续的通胀超出美联储的预期，最关键的就是俄乌冲突。这个不在美联储，也不在任何经济学家的预计范围之内，美国特别是在5、6、7月，包括8月，通胀的主要原因就是能源推动的，从货币超发推动慢慢转化为能源价格上涨推动。拜登政府为了控制通胀，在过去一段时间重点采取的政策手段就是打击国际油价，货币超发的因素已经慢慢受控制了，这个变量的影响较小。拜登政府想控制国际能源价格，在某种意义上是控制住了，至少预期是控制住了。现在导致美国通胀的因素既不是货币，也不是能源价格，而是劳动力问题，劳动力短缺正成为当下美国的通胀重要推动力。

我做了一些研究，美国现在因为新冠疫情直接死亡的人数在100万人以上，平均年龄74-75岁，在美国60岁、65岁以上的也作为劳动力，这100万人不是因为新冠疫情也应该被纳入劳动力中，这100万人的劳动参与率大概是13%左右，也就是说有13万人，如果不是因为疫情死亡，本来会加入到美国劳动力里。

第二，疫情带来所谓的长期新冠综合症，统计下来大概有300万人不愿意加入到劳动力队伍里去。也就是说，拜登政府统计的失业率3.5是真的，不是反映了美国经济在强劲增长，数据也显示经济在第一季度、第二季度是衰退，但是和失业率低形成一个反差。按照拜登说法，经济没有问题，这是不对的，恰恰说明美国经济指标出现了严重悖论。

王战：不能用常态化做分析，这里面有很多特殊的因素。

宋国友: 我做了分析, 把这个特殊因素找出来, 刚才讲的超额死亡, 加上疫情综合症的劳动力退出, 使得美国劳动力供给出现大的问题。我还没有统计所谓的失业率里有多少是零工, 多少是全时, 多少是居家办公, 多少是在公司办公, 这导致的劳动力是不一样的, 体现的真实劳动服务总量也是不一样的。美国经济很大的问题就是劳动力供给不足, 哪怕拜登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还有问题还会出现。问题是什么? 就是拜登所力推的供应链脱钩所带来的竞争成本, 中美越来越清楚这样一种脱钩带来了成本扰动, 以及成本上升, 因为它要重新配置。现在这个价格是不确定的, 这都是在动荡的过程中, 还没有形成较为一致的价格均衡, 现在全球价格不均衡, 都在动, 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最后可能会出很多问题。如果要形成一个相对均衡的价格, 中美战略竞争要处于较为可控的预期之内, 这个需要时间, 这恰恰是全球价格出现重大扰动的时段。而且从中国的应对来看, 我认为中国不会像以前那样积极配合, 这给美国通胀带来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 从货币超发到能源价格上升, 到劳动力供给短缺, 再到战略竞争成本所带来的通胀上升, 美联储或美国政府应该正在考虑这个问题。现在美联储短期之内不断加息, 如果把 11 月份加 75 个基点, 12 月份加 50 个基点, 一年之内就将近 5%, 现在 3.75%。参考上世纪 70 年代末, 如果现在沙特不遵循拜登的要求, 要去减产, 这将是美国通胀另一个难以控制的因素。我感觉美联储必须要加息, 不加息的话

通胀是恶性的。

劳动力供给在美国市场经济里很难控制的，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去慢慢鼓励、调整，但是需要很长时间。这样一种劳动力供给，如果未来不能控制的话，通胀肯定是在高位下不来。出现一个倒 V 型的转折，我觉得困难比较大。如果在 6%-7% 以上持续数月的话，好比这个人一直在高烧，美国经济就一直处于困难当中，不确定性也很大。所以美联储必须要把通胀放在最优先的位置。

后续问题是什么？是美国经济可能会衰退。最开始美联储肯定忍一忍，为了促增长，在防通胀方面不那么用力，它也在赌。但是没想到俄乌冲突发生，价格压不住了。美联储如果想急速抑制通胀的话，经济增速这一块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现在问题很严重，美国房贷利率已经到 6% 以上了，这个如果持续半年到一年时间，美国楼市就会出现很大问题。

王战：美国楼市景气只有一两年时间，2007 年次贷危机也是房贷问题。

宋国友：相对于美国通胀，更应该担心的是因美国快速加息所导致的资产价格问题，美国经济在 2008 年后一直没有实现真正的强劲增长，都是在艰难的 2%-3%。现在因为疫情的冲击，不断注入流动性，勉强继续增长。但是加息之后，我感觉美国经济恐怕会出现大问题，现在美国还可能面临输入性通胀的问题。

王战：刚才你讲的情况和这次伯南克拿诺贝尔奖有什么

联系吗？

宋国友：这个我不知道。在某种意义上，现在的政策也不能说完全不对。我们要先把中国经济稳住，如果真出问题，我们再出后续政策。放松管控绝对是应对明年可能出现的全球通胀的最大利器，我只要宣布明年放开，一下子生产力、生产关系出来了，会有助于应对明年的经济问题。欧洲现在已经这样子了，能源、制造业空心化，各个国家政治的分歧，我感觉欧洲很惊险，世界经济真的很惊险，也看二十大报告会有什么政策。

王战：关于明年经济工作的三个会议，一个是七中全会已经开过了，一个是二十大，二十大一过马上就开经济工作会议，安排明年的经济工作，就看今年的经济工作会议对明年经济做什么样的安排。

宋国友：明年对经济放松管制，是应对世界经济不确定性的最好的一个手段。这个手段现在不能用，现在确实面临非常艰难的人民第一、健康安全和经济增长的问题。如果明年疫情发展的情况允许，同时经济压力很大的话，放松管制将帮助中国冲破世界经济周期，这是一个很好的事。

王战：哪怕把现在的三句话“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换个次序，都是好事情，可能下面的预期就发生很大变化。

宋国友：2007年初，中央当时面临对经济的判断，第一是防通胀。现在如果把“经济要稳住”放在前面，等于一下子把过去积累的被压抑的消费、生产、投资反弹出来，是冲

破世界经济周期的一个很好的手段。

王战：中央出 33 条政策，上海出 55 条政策，都是供给侧的。你刚才讲的是需求侧方面，促进最终需求的政策一条都没出。老百姓面对三年的枯竭，所有政策都出在供给侧是没用的。对于沙特，我有两个解读，这次沙特这么对拜登，是“外交羞辱”。还有一条是做给中国和印度看，美国不用它的东西，它最大的客户是没有石油的，而且人口这么多，一个是中国，今后替代美国市场的是中国。

乔依德：现在中国已经是第一了。

王战：还有印度，如果把这两个大客户弄住了，美国跟沙特没有关系。

彭文生：现在拜登政府做的事情就是要沙特这些石油产出国的命，第一是搞绿色能源，石油以后没用了。第二是要推动把俄罗斯油价限在 40 美元，肯定对全球石油有影响。沙特看到拜登政府做的事情就是要它命的事情，所以沙特没有办法。

王战：沙特好日子过惯了，它现在要维持政府财政预算，需要石油定价在 80 美元一桶，如果再往下压，维持政府运转都有问题。而美国实际上把 60 元左右作为基点，油价到了 60 美元页岩气才有开发价值。

乔依德：以前沙特把记者杀了，民主党追的比较厉害，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沙特的意愿是希望共和党上来，这已经涉及到美国内政了，现在民主党很气，共和党至少没吭声。还有一条，沙特阿拉伯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

美)今年赚死了,它现在要搞一条绿色的路,在这条路边上投资几千亿,这次是在联合国开会的时候,它在美国搞了一个很大的招商会。

徐明棋(上海国经中心副理事长):沙特马上要接班的是王子,他是民主党激进派的死对头。

乔依德:美国不敢动沙特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伊朗问题,如果美国完全跟它切断关系,会助长伊朗的势力。

夏春(银科控股首席经济学家兼金融研究院院长):首先我们要承认通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理解的经济学,以我读了这么多年下来的理解,经济学还非常不成熟。刚才讲到伯南克,他获得了诺贝尔奖,他的研究实际上是对于1929年到1933年大萧条的研究,过去了50多年他才研究清楚。在他之前研究的是弗里德曼,弗里德曼的研究结果被证明错了,弗里德曼最有名的是货币数量论,这个也是错了。一个诺贝尔奖,而且是对经济学影响最大一个人,他最重要的几个理论都是错的,表明经济学本身就非常不成熟。

第二,我们对通胀理解也很不成熟。它背后有很多假设,这些假设都不成立。历史上的通胀都是货币被打乱,后来的研究认为通胀除了货币因素以外,还有人认为是财政问题,这个人现在没有获得诺贝尔奖,他当年提出财政理论也非常受重视,通胀财政理论可能在国内没有太多人讲。简单来讲,一个国家的财政赤字太高了以后,老百姓对国家的执政能力是没有信心的,没有信心就会产生很强的需求去保护自己。

还有一个历史学家讲的理论，通胀其实无时无刻都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们今天面临的高通胀，我个人认为，可能要等到 5 年、10 年后才能真正把它理解清楚。我们现在去理解 70 年代高通胀，很多时候都是不全面的，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比方说 2008 年金融危机，大部分人认为是房地产泡沫导致的，其实不是。经济学家把这个问题研究了两年，2010 年才发表一篇文章，其实是银行的挤兑。

回到现在，通胀目前这么高，大部分共识都是要回落，但是回落的速度，现在市场上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会比较快的回落，就把 2019 年之前的通胀环比数据找出来，平均数据找出来，算出来之后发现会比较快的回落。但是回落之后，不可能回到现在美联储想要的 2，可能还是在 3 左右，或者 2.5 到 3 左右。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涉及到太多的因素，有劳动力因素，有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这些因素变得不可控。我们回过头来看历史上发生的事情，看过去 100 年的事情，现在经常讲百年变局，把 100 年的数据拿出来看，就不会那么乐观。今天上午我们发了一个数据，从 100 年美国的数据来看，只要它的通胀超过 5（现在是 8.2），回到 2.5 平均要 46 个月，接近 4 年。美联储希望明年降到 2.5，历史数据没有那么乐观，如果从 8 回到 2.5，可能需要更长时间。

另外一个百年数据是战争带来的影响。现在绝大部分人拿到的商品数据没有那么长的时间，但是有一些研究机构花了很多工夫找到 100 年前的数据，从 100 年前到现在，

商品价格基本上有一个特点：10年牛市，20年的熊市。为什么有牛市？牛市全部跟战争有关，一战是第一次，二战是第二次。70年代以色列打了很短的几天战争，但是产生的影响却时间很长。再下来的牛市是中国加入WTO，中国的发展。有人认为实际上跟两次战争有关，第一次是伊拉克，第二次是阿富汗。这次俄乌战争是一个很大的战争，对供应链的破坏不是简单集中在俄乌两个国家，刚才提到沙特，还有中国，带来长远的影响，可能也是十年的。

在这种情况下去思考这个问题，你就会发现想要明年通胀快速回落，是比较难的。虽然说现在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但是很多问题又在重复，所以看到100年来的数据，就有很多担心。

还有一个特别的数据，就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数据。从数据发现，对通胀影响最重要的因素是人口，是消费主体年轻人比重。换句话说，对70年代的通胀，一般人找到的理由是石油危机，是美元贬值，但如果你看人口，实际上是“婴儿潮”占比急速上升的过程，即使把石油因素去掉，由于人口消费非常强，这个通胀也降不下来。现在也是一样，美国在2000年后出现了一波所谓的“千禧潮”，这批人在20多岁左右。因为父母那一代经历金融危机，经历互联网泡沫，他们之前没有买房子，而是把钱存在股票市场，享受了股市繁荣。现在他们有钱，正好进入到结婚、生孩子，重新购房的需求很高，导致美国过去两年房价上涨。不光是货币推动，还是人口推动。由于疫情，生产跟不上，建筑

跟不上，建筑材料价格上涨。现在的问题是，拐点在哪里？数据很明确，因为人口数据是最稳定的，拐点发生在 2025 年，2025 年美国消费群体占比才会下降。

刚才讲的三个因素合在一起，我比较倾向于通胀会回落，但是回落会比大家想得慢。一旦到该回落的时候，也许又会加速回落，毕竟之前长期停滞的因素还在：技术替代、老龄化，大家不怎么消费，储蓄很高，这些都压低总需求。这基本上是我对通胀这件事的看法。

如果要稍微展开一点，回到刚才讲到的对全球的影响，美国明年也会衰退，甚至现在已经衰退了。衰退是一个事后的定义，通常晚半年才告诉你是衰退了，甚至可能晚两年告诉你。现在美国是不是衰退不知道，失业率是好的，但是有一些是假象，有一些指标是符合衰退定义的，包括股市跌成这个样子。

现在问题是，衰退是否会把通胀拉下来？我告诉你，从数据来讲，通胀在衰退期间从来都是往上走的，衰退快结束时通胀才下来。如果美国突然声明它已经衰退一段时间了，反而是一个好消息，如果它现在说还没有开始衰退，那就麻烦了，因为历史上面通胀都是在衰退中间才达到高峰，然后才往下走。

反过来讲，欧洲衰退的迹象比美国还要明显，包括中国。中国的问题刚才彭老师讲得很对，我在上次开会时也讲了一下，我后来写了一篇文章，但是公司不让我发。经济学家可能都是有共识的，特别是刚才提到的成本的问题。经济

学里的成本是机会成本，不是直接成本。医学家算的是直接成本，直接成本就是保了 2.6 亿的老人，2.6 亿老人比全世界很多国家的人口都多了，从这个角度讲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你算机会成本，就是剩下 11 亿人的成本，没有人去算。

彭文生：现在小孩子的出生率明显下来了，这个成本怎么算。

夏春：回到刚才说的百年变局，100 年前一战爆发，直接导火索是刺杀事件，深层矛盾是英国和德国的冲突，一战的疫情是在后期，疫情反而是导致一战结束的重要理由。如果从历史来讲，非常相似，包括贫富差距。从中央的决定来讲，确实是把安全放在了头号的位置。但是从我们经济学家的角度来讲，我们认为经济稳定了，政治才更稳定。但是他们认为先要把人稳住，其他的都可以不那么在意。

彭文生：其实发展下去和想要的正好反过来，现在社会怨气很大。以前反腐、扶贫，社会底层很支持，现在社会怨气很大，这个搞不好要出大问题。

徐明棋：刚才大家讲得非常好，从不同侧面谈了这次通胀一些不同的点，包括美联储持续提高利率背后的考量，再结合中国的情况做了一点分析。王战主席在内部讨论会上曾经提出过这个问题，不能仅仅从美联储常规操作视角来看待货币政策调整以及这次通胀形成的原因，原因是复合型的。我想谈这么几点：

第一，这次通胀是 40 年来前所未有的高通胀，与 70 年

代高通胀相比，到底有哪些因素不一样？我大概看了有三个主要因素不一样。

首先，地缘政治冲突和那个时候比，完全不一样。这次美国面临中国、俄罗斯的崛起，有这样一个大的地缘政治加剧冲突的背景。俄乌战争导致能源、粮食价格大幅度上涨，大宗商品价格也在高位运行。70年代通胀是由金融危机冲击所导致的高通胀，有一定的相似。但是那时的石油价格上涨和这次石油价格上涨，以及其他大宗商品上涨，是不一样的，那次是由于石油输出国组织因为长期以来的低价，导致他们认识到需要组织卡特尔，对长期以来的石油低价进行一次性调整，或者两次性调整所导致的。

其次，那个时候没有经历过全球化的红利。这次是在全球化之后，美国、欧洲的民意推动去全球化或逆全球化的政策操作，导致供应链的全新调整，必然导致生产成本上涨，物流成本也上涨。

再次，疫情冲击。70年代没有疫情冲击，只有石油价格大幅度上涨，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就是越南战争。这次疫情的冲击不可忽略，因为疫情到今天都没有得到完全有效的控制，哪怕美欧用常态化进行应对。100万人死掉，对劳动力供应影响很大。我认为大多数人都无所谓，但是在美国的华侨群体、亚裔群体还是小心翼翼，避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这些进一步证实供给侧的冲击是以前没有碰到过的，以前供给侧对通胀也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主要还是长期的凯恩斯政策导致有效需求的快速扩张。

刚才大家讲的我非常同意。这个时候我觉得很重要的是，美国现在的货币政策很难在短期内把通胀迅速降下来，因为有很多因素，而货币政策单一调整的短期内效率不会那么高。这不像一个纯粹的需求冲击，货币政策一收缩，马上需求受到遏制，通胀迅速回到低位。

这次还有一个不同之处，美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调整，实际上是存在问题的。货币政策连续两年维持在 0 到 0.25，从 2020 年 3 月份开始，把利率一下子降到 0.25，维持到 2022 年 3 月份 17 号。两年的 0 到 0.25，加上量化宽松刺激，最终是要通过货币口子释放出来的，通货膨胀就是一个货币现象，这个大框架应该说还是成立的。货币龙头如果不是那么宽松的话，各种各样的因素不可能导致通货膨胀快速上升。但是美联储对通货膨胀的判断是失误的，因为美国的通胀在 2021 年底已经开始启动，2021 年 6 月通胀已经突破 5%，但是这个时候美联储说通胀是阶段性的，是由于疫情冲击物流等等。它到 3 月份才开始说是供给冲击，之后不得不大幅度快速提高利率。美联储受到广泛批评后，它的信誉不仅在美国国内，在全球都遭到拷问。地缘政治导致金融手段武器化，大家对美元的信任程度下降。现在它要重新建立起信任，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考量。

第二，这次通胀之所以很难把它压下来，通胀快速上升到这样的高位，不光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也是很重要的原因。美国在过去一个周期，财政赤字增速太快。

王战：6.2 万亿美元。

徐明棋：财政赤字规模不断扩大，财政赤字最终导致货币增发，财政金融理论已经讲到这一点了。现在民主党为了收买人心，和共和党竞争，它的财政扩张性导向并没有改变，它在国会通过补贴应对气候变化，这些都是要钱的，包括给老百姓发钱，都是财政赤字发的钱，就是发印的钱，必然会导致物价无法稳定。

第三，地缘政治操控也是很重要的因素。现在美联储快速提高利率，可能会使资金回流到美国，同时带动美国国内投资有积极的效应，提高供应链的安全、韧性，又提供巨额的财政补贴。这些企业进入美国，包括欧洲企业，包括韩国都要到美国投资芯片，台湾的企业到美国投资。这块地缘政治意义的增加，可以弥补它 GDP 的下降。对于美联储大幅度提高利率，拜登政府通过国会，通过很多途径来批评。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美国主流经济学家并没有很大的批评，想当年沃尔克在里根政府时期，提高利率的做法是遭主流经济学一片批评的，里根当时甚至是骂沃尔克。我们现在看到拜登政府的考量已经发生变化，也就是说拜登政府实际上从地缘政治这个角度考虑，认为这个时期提高利率对美国并非不利。

美联储的考量中，就业率是最主要的衡量经济增长的目标，9 月份失业率有进一步的下降，失业率只有 3.5。当然这个现象的背后，如果你深入分析，会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可能有虚假等等。但不管怎么样，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导致美联储认为今年经济增长再怎么下降，今年也有 1.5 到

1.7 的增长，明年再怎么不乐观也有 0.3。IMF 在 10 月份发表的报告，预期明年增长 0.3，也不是负增长。所以大家都说是温和的衰退，这给美联储调整货币政策提供了较大的空间。所以它现在要把信誉建立起来，把通胀先压下来，我估计这是它考虑的最主要的因素。地缘政治的考虑也是重要的。

从这个意义来说，接下来尽管美国通胀会维持比较长的时间，美联储鹰派货币政策仍会持续，估计会持续到明年上半年。有的人很乐观，认为接下来就会降息，通胀一旦往下降，美国又会降息刺激增长。11 月份大选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就要考虑美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搅合在一起，对我们形成怎么样的冲击？在金融渠道对我们的冲击是有的，但是还是可控的。因为中国资本账户还是管制的，冲击可能不是那么可怕，但是对实体经济的冲击不能忽略。我们现在觉得美国对我们商品的需要，客观上不会那么大，有两个因素，一是美国国内的总需求下降，二是它的政策导向。美国企业愿意卖给我们高新科技产品，但是受到管控不能卖，很多芯片不卖给你，设备不卖给你。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对美国的出口也受到影响，因为我们买它的设备，生产的最终产品很多还是要销到美国去的。

欧美企业投资这块，我们现在的统计数据看上去好像还不错。但是我们吸引外资的数据，我觉得水分比较大。中国企业在避税地登记注册的企业都认为是 FDI，还有你的企业

更新都属于 FDI，所以这块我们永远是对的。

宋国友：有一个报告分析，中国外资引入的 75% 是内资转香港，再转外资回中国，都是中国人投中国。

徐明棋：数字是不错。但是来自欧美、包括日本、韩国，相对来说技术水平比较高的投资，真正带动中国产业升级的投资越来越少。这可能对我们的经济产生长期不利的影响。国内讲的是不脱钩，继续维护和美国的经济共赢，扩大经济互利共赢空间。德国总理朔尔茨要来，这个消息已经公开了，当然还有一些细节要再进一步探讨，但是他肯定是会来的。我们现在的形势还是比较严峻的，需要进一步做好欧洲的工作。朔尔茨只是对美国讲了一下，与中国脱钩错误的，是不可能的。我们这里把他作完全正面的解读，把德国经济部长和外交部长在此之前讲的很多言论全部给覆盖掉了，看得出来我们非常重视这次访问。现在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之下，不确定因素增加了，实际上给我们增加了很多困难。

刚才大家谈到内部调整，美联储持续提高利率，总体上对我们来说，挑战还是比较大的，不能忽略。还有汇率的问题，原来讲汇率下跌对我们出口有利，但是现在出口形势受到产业链重新调整的影响，受到北欧经济进入滞胀下降的影响。最近两年，2020，2021，一直到 2022 年上半年，中国经济保持不错的宏观数据，还是来源于出口。如果接下来出口不增长，或者增长非常低速，中国经济面临的困境将会更大。启动内部的消费，我是不指望的。你要财政真的下大力

气印钱发给老百姓，财政部首先就不同意，财政部那些专家会找出千百个理由来反对。再加上我们潜在的赤字，医保、社保的亏空都是很大的，都要填。我觉得外部环境对我们未来经济的影响是最重的。尽管我们讲内循环，这个涉及到改革，一改革利益格局，要动起来就非常非常难。像民营企业、小微企业要怎么怎么解救，政策没有办法落到实处。金融机构贷款给中小企业，统计数据在增加，实际上增加的都是那些不很缺钱的中小企业，或者是依靠国有企业，或者是从大型企业集团下分出来的中小企业，真正独立经营的中小企业仍然是贷款非常困难的。

乔依德：现在是一个比较关键的时间点，大家讲的我都同意。我的第一个观点是，美国现在加息也好，或者说货币政策收缩，主要出发点还是国内。尽管我们自媒体常常说这是割韭菜，薅羊毛，但是我不知道它怎么薅羊毛。拜登不像川普，他也明白整个氛围，不把通货膨胀压下去，中期选举会有很大问题，这个他还是比较敏感的。

第二个观点，对中国的影响。现在美国高息，肯定影响美国经济，也影响全球经济。至于是不是衰退，那是一个定义，不是最重要。这对我们中国影响很大，现在也看出来，出口订单已经下降了，船运费开始下降了。当然，我们国家由于资本账户还没有完全开放，跟其他国家不一样，现在全球央行全部加息，除了日本和中国。

徐明棋：土耳其是降息。

乔依德：出口对于中国经济的稳定有很大影响，要加以

关注。有一点大家还没有讲到，前几年“一带一路”对外投资很大，这一点可以提一下，特别是主权债务。现在IMF和世界银行都有很多计划，但是这基本上是官方的债务，实际上发展中国家占大头的是私人债务，私人债务大部分还是发达国家的。在这里面中国比较吃亏，西方的矛头实际上对准了中国。要考虑怎么通过这次发展中国家主权债务重组，减少我们的损失，并在地缘政治博弈中继续保持有利地位。今后要通过主权债务重组，使我们对发展中国家的放债纳入一种比较健康的方式。以前我们希望用双边的、私下交易的方式，现在人家吃透你了，到了最后说还不起，反正我们都豁免。这样长期下去，不是一个好办法，对我们国家财政也不是好办法，对整体也不是好办法。根据我跟央行的一些接触，他们现在考虑通过多边的方式。最近我看到消息，巴黎俱乐部提出斯里兰卡的债务重组，希望中国和印度参加。我们中国表态，愿意跟多边一起来谈，这也表明了一个态度，我们对国际规则是支持的，这个很重要，这一点应该要有关注。一般老百姓不知道外面到底有多少钱，有一个说法是五六千亿美元，前两年投得很多，这两年投得比较少。所以，还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经济搞好。

应该承认奥密克戎的致死率下降很大。车祸死亡的比例很低，但每年因车祸死亡的人也不少，是不是就不开车了？光强调基数大是不能说服人的。

彭文生：我们一年死于癌症的人比其他国家肯定多。

王涵：我做过计算，香港今年2月份奥密克戎的死亡人

数是总人口的千分之 1.2，日本这波疫情的死亡人数是总人口的万分之四，如果拿这个数据乘以中国的 14 亿人，香港数据对应的是 170 万死亡，日本数据对应的是 60 万死亡。《柳叶刀》在 2019 年有一篇文章，讲中国各种流行病死亡人数和它推出来间接死亡人数，中国甲乙丙三种流行病 2019 年死亡人数是 2.5 万人，如果考虑到所谓超额死亡的话，2019 年的数据推出全年流感死亡人数是 8.8 万人。

彭文生：这是一个灾害，它已经发生了，不可能不死人，关键是不能为了不死人不惜任何代价。

乔依德：美国是这样的，只要你死亡时有新冠，即使不是新冠引起的，它都算，我们不是这样算的。

彭文生：这里还有一个统治艺术或治理艺术，现在做下来，老百姓把所有怨气都撒在政府身上。老百姓看到死一点人，反而能主动理解，现在的做法只能把所有怨气全部推在政府身上。

宋国友：美国死那么多人，为什么民众没有闹？政府说，我要给你们打疫苗，你可以选择打或不打，政府要做的是找更多疫苗提供给你，如果不打，死亡怪你自己。

王战：说得很清楚。

宋国友：我要做的是找疫苗，提供疫苗，你们要做的是打疫苗。

乔依德：现在弄得层层加码，不要说经济，连活动都没有办法安排。我要开一个会，别人第一句话“因为疫情，我不确定能来还是不能来。”而且对外联系对我们影响很大的，

IMF 和世界银行开年会，没有中国人去。现在到了什么程度？中国社科院的一个人说，我自愿回来隔离，上面都不批准，认为你是非必要出差，跟外面都不交流了，其实有那么多重大的事情需要好好讨论。

彭文生：说到底，应该让制定政策的人，包括专家自己，尝一尝被隔离的味道，被失业的味道。现在政策制定的人，拿工资，生活不错，还挺好的，他们理解不了。

乔依德：总归要稍微调整一点，不一定完全放开，可以慢慢来。香港是一步一步来的，3+4，0+3，对老百姓有信任。新加坡政府跟老百姓解释，包括死亡率是多少。

彭文生：这是病毒，病毒是不会消失的，要怎么办呢？

乔依德：你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抗日战争的目标很清楚，把日本赶出去。你这个是要消灭这个病毒，还是到什么程度？没人知道，就这么下去。我觉得很难理解。如果发生情况，家里自己隔离，吃点药或者自己做抗原测试，这个也可以，并不是全部不管。

彭文生：现在欧美不能提中国，提中国就没有可讲的了，关系已经恶化到没有任何的民间接触。现在有一个风险，中美双方越来越向极端走，美国人要封锁我们，我们要怎么办？为什么要封锁我们，或者在哪一方面封锁我们？哪些地方我们还可以做些事？现在一个不好的动向就是双方的对抗越来越加剧了。

夏春：回顾一战，当时有的国家不知道为什么要打，就打进去了，梦游一样。后来为什么突然不打了？一个是疫

情，另一个是大家突然发现在打一个没有意义的战争，就停了。

王涵：我最近在想一个问题，中国经济发展的背后，到底是外部条件制约中国经济的增长，还是内部的因素。这对政策来讲，是完全不同的逻辑。

欧洲自工业革命之后，基本上几十年就会打一仗。我们知道市场经济有一个特点，在一个封闭体系搞市场经济，最后一定市场不足，这个为什么要开拓殖民地，因为需要外部市场，需要外部的资源，否则制造产能不断上升，但是原材料不够。每个人都想当资本家，你赚1块钱的GDP，肯定有两块钱的储蓄，导致需求不足。到18世纪、19世纪，每一次全球市场分完以后，就会打起来。民主是最好战的体制。比方有两个政府官员说要选总统，一个人说我们经济不行了，要过点苦日子，这作为普通人来讲是正常的。另外一个政客说，不行，我们要举债，后面那个肯定当选。但是当债务举到一定程度以后，就不行了，你必须要苦日子了。结果另外一个人跑上来说，不对，我们日子苦不是我们的问题，是中国人抢了我们的市场，咱们去打它。回到经济的问题，我们在讨论宏观经济增长时，总是假设我们的外部市场是可以无限扩张的，资源是无限扩张的。但是事实上，每个经济体的市场和资源都有天花板。在草地上原来这里都是羊，你说我要养兔子，你不把羊赶出去，兔子是没有办法养的。你的效率到了一定阶段，经济模型就要回到马尔萨斯那个阶段。

我们讨论中国经济宏观增长的时候，我们究竟讨论应该要更多的效率，让这些兔子生得更多，还是说羊群就想来抢我的草？事实上有一个从宏观经济学到政治经济学的过程，如果这个观点是对的，我们现在所有这些政策是不是都搞错了？

宋国友：我感觉我们领导是用政治经济学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来治理我们中国的。但是我们专家还是从经济学、管理学等各个学科的角度得出一些结论，提供一些建议，最后这种东西就有问题了，所以伟大时代真的是政治经济学的时代。

王战：你刚才讲的是有道理的。给你一个最有利佐证，日本跟中国友好的时候，首相只能当选一年。安倍上来以后，把矛盾从钓鱼岛转向中国是最大的经济威胁，他就连续当首相。在民主选举的国家里，国内经济情况不好的时候，最好的办法是把矛盾外化，一外化他就站住了，结果造成地缘政治矛盾冲突，这个地缘政治一爆出来以后，就变成现在这样。

我出这个题目，就是想搞明白一个东西：现在美联储三次加息 75 基点，这样做是对整个形势判断不到位造成的，还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判断不到位，前面已经有迹象露出来，就是认为这次通货膨胀是暂时的。它也可能对经济衰退判断不足，认为就是轻微的衰退，对这次危机的判断没有到位。

另外一种说法，是从美国利益去考虑这个问题。如果从

美国利益去考虑，你现在这样做，就使所有其他国家都进入衰退，也可以说是薅羊毛，美元变成强势美元。前段时间说“一带一路”砸了6千亿美元，现在美元变成强势以后，倒是可以把这些破破烂烂的东西都收拾了。现在的德国是最典型的案例，本来经济挺好，这次一弄经济不好了，60多个德国企业到美国去了，因为成本高了，光是能源成本就是原来的4倍。我认为这个薅羊毛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第一阶段是美国提出制造业回归，结果发现中国转出去的都到越南、印度去了，劳动密集型不可能回归到美国，它要更高端的制造业。你们不去，叫你们把销售记录全部交出来，做了个样板出来。台积电去了，后面三星要去。现在民主党有点像中国，用优惠政策。现在它不需要了，强势美元一出来，各国经济都不好了。

强势美元现在对美国有意义，原来它是和石油绑定的，本身是有实物支撑的，现在变成一张绿票子。绿票子最大的矛盾在什么地方？这个货币搞得不好就贬值了。美元贬值，对发展中国家、其他国家是损失，但是整个美元作为全球国际货币也是一种很大的损失。现在有的国家不用美元结算了，这对美国来讲威胁太大了。如果大家不用美元交易，美元的问题就大了。

美国本来是靠它的经济实力，后来经济实力下降，一个是靠军事威慑力量，还有靠高科技，还有与石油交易绑定的力量，来支撑美元从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后的这么长时间。后面靠什么？美国和沙特的矛盾，我认为已经进入一个拐

点，它今后靠不了美元了，它今后靠什么？实际上提出很多问题。

我一直在想，没搞清楚美国是有意识，还是迫于形势做这件事情。如果是迫于形势，可能按照西方经济学的常规理论菲利普斯曲线，现在就业挺好，就解决通胀问题。但是这个就业它已经不是常规的就业，新冠病毒起码是三个数据，1600万，这是新冠病毒所影响的就业，其实可能还不止。然后是400万，因为新冠病毒400万劳动力丧失了。400万中又有100万死掉了。再加上另外的因素，现在难民进不来了，墨西哥非法移民进不来了，对很多低端段服务业都有影响。这几个因素凑在一起，造成现在这些问题。

如果对美国这次通胀的源头不搞清楚，你研究中国问题，始终有好多外部形势看不透，今后怎么应对也讲不清楚。去年工作会议在扩大投资，当然已经在做了，但不像1989年以后，美国人不投，日本人、台湾人来投，也不像2000年美国压了很多条件，160多个国家都跟你谈条件。我们一加入WTO之后，实际上是拿到最大好处的。911本来是要整中国，因为911又把中国放过去了。这次你看连疫情也对中国表示不满了，什么地方都不砸，砸在上海头上。疫情砸在上海头上和砸在哈尔滨完全是两回事，因为你毕竟是一个开放枢纽，又是金融中心，又是贸易中心。上海拿不出消费券，国家补贴1千亿发消费券的这脚油门不踩，还是讲供给侧改革，那是不行了。现在国内主要矛盾面是需求方，这三年把老百姓的购买力弄下来了，你没有购买力，

这是大问题。

所以我说，美国用的政策应该是给中国用的。我有两个朋友是摩托罗拉副总裁，住在上海，他们在中产阶级算是富有的人，美元给寄过来了，一个人每月 2400 美元，另一人是 1200 美元，没少过，就是发钱发到个人。我们上海两个半月关着，已经退回到部落了，我们已经成了社群部落、保供经济。原来讲市场经济很容易退回去，这次的保供经济比计划经济、票据经济更加计划，所以一不小心退回去很容易。

乔依德：不知道这次二十大文件里有没有现在某些人鼓吹的人民经济？

王战：这个是瞎弄，都是玩文字游戏。

夏春：现在已经叫人民金融了。

王战：你讲人民至上是可以的，就讲一部分地区怎么富起来，怎么走向共同富裕，把这个问题研究好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发明一个新名字“人民经济”。

夏春：法国、德国领导人在二十大后要来，我们要跟欧洲搞好关系，这个非常重要。昨天上海财经大学一个教授把他的研究发给我了，他做了一个很好的研究，是这个领域中国最好的专家。他算了一下，脱钩对我们的影响。一种是美国跟中国脱钩，但是全世界都跟我们玩，这个影响不是太大。他做了模型，然后去测算，这篇文章发在人大的一个内部刊物。

只是中国跟美国脱钩，对于实际收入影响（实际收入占

GDP 的比重)，对中国是 GDP 的 0.8，美国是 GDP 的 0.38。美国不太依赖贸易，如果它跟中国脱钩，其实损失不太大。

但是如果美国拉拢欧洲跟中国脱钩，中国的损失从 0.8 变成 2.7，美国的损失只有 0.39。在这个情况下，德国、法国的损失大概在 0.4 左右，损失比美国要大。欧洲也不见得愿意跟着美国搞，所以中国跟欧洲搞好关系很重要。

如果全世界都跟中国脱钩，中国自己玩，这个可能性不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福利损失是 6.5，美国只有 0.41。

美国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大陆，又是服务业为主，美国过去这些年没有想到中国发展这么快，尤其是 4G、5G 在中国应用，中国人自己都没有想到。等到特朗普意识到，后面拜登意识到，就在不断加强对抗。我个人感觉，美联储不是有意，当然有政治考虑，因为美联储本身是一个官僚机构，不可能指望所谓公开委员会的每个人只思考通胀的影响，大家都是你看着我，我看着你。2020 年 6 月份美联储调了政策，你让它很快去加息，也不大可能，当然涨到 5 还不加息，确实是慢了。你说这里面是不是有阴谋论，我不觉得，应该还是一个认知的落差。后来等到不得不加使，它也是没有办法。

千万不要高估美联储的能力。你回看美联储过去几年的记录，其实是很不好的：2012 年就觉得要加息了，也没有加；2013 年觉得要加，又没有加；2015 年才加了一次；2015 年预测 2016 年，说要加 4 次，又没有加；到了 2018 年市场觉得不应该再加了，它又加了 4 次。我觉得美联储的鹰派可

能又错了，这次衰退不仅是美国的事情，可能欧洲和中国都衰退，把美国拉下来，然后美联储明年没有这么鹰派，可能又会好一点，这是我希望的。

说到最后，美国有没有想把欧洲的企业拉过去，特别是制造业。现在就要搞清楚北溪管道是谁炸的，大家基本上 80% 认为是美国干的。美国走的这一步，想着要把欧洲的东西拿到美国去，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靠后的决策。

王战：我的观点是比较中庸的。拜登这个班子，很多决策不是拜登的决策，他们在特朗普执政的时候，已经长期在研究怎么对付中国。你看拜登这次拉帮结派操作的熟练程度，比我们孙子兵法都搞得厉害，不是一时性起的，是想清楚的。美国在中国脱钩上的想法也不是一时性起，美联储至少受这种氛围的影响。

宋国友：美联储副主席和国安会负责亚太事务的主管是夫妻。

彭文生：美联储这一次可能犯了一些技术上的错误。美联储作为央行，这些货币政策委员会开会，背后得有技术支持，那些工作人员给他们提供一个经济分析，我相信美联储政策的后背后有技术的层面。技术犯了什么错误？美联储主席 2021 年 2 月份在国会听证时已经讲了。当时国会议员问：你这个货币一下子增长这么多，你认为没有通胀问题，你怎么解释？他解释说：过去几十年货币和通胀的关系非常不稳定，不是说货币起来了通胀一定起来。世界央行很少谈货币增量，货币增长和通胀的关系已经很不稳定了。但

是美联储犯了什么错误呢？货币有内生的和外生的，外生的肯定能导致通胀，内生的因为个人行为不一定导致通胀。过去几十年货币是内生的，这次是财政赤字，这次是外生的。所以美联储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忘记了货币数量论，货币数量论讲的是货币是外生的，所以货币扩张带来通胀。这是第一个错误。

第二个错误，美联储过去几十年不看货币，它用什么变量看通胀？就是所谓的潜在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实际增长超越潜在增长很多，就有通胀。所以过去几十年，各国央行花了很多资源去估算潜在增长率在什么地方，这是比较成熟的，虽然有不确定性。但是，谁都没有想到这次是一个疫情，疫情在 2020 年导致这么大的 GDP 下行，失业率一下子增加这么多，就有一个问题了，潜在增长率到底有没有变化？美联储认为潜在增长率实际上没有变，因为这是短期的。潜在增长率是供给的概念，实际上供给是下降的。潜在增长率是看中期、长期，还是看短期的？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错误。

王战：我还有两个判断，供你们参考。朔尔茨原来实际上是被绿党绑架的，你看他基本上很少表态。这次公开讲不脱钩，要到中国来，实际上就是你刚才讲的问题——美国和欧盟之间联手的问题。现在不光是德国，还有法国，联手是联不起来了。现在从整个欧洲的情况来说，美国实际上状况比我们原来估计的要好。

夏春：美国有天然气这些东西的优势。

宋国友: 经济学计算有时候太过于利好。很多人估算中美贸易战对于中国和美国各自的影响，很多数据。另外一个估算中国加入 WTO，对中国经济增长很多，对美国的影响不怎么样，是负的。

王战: 当时算的全部是错的，都说 WTO 影响汽车零部件、农业农产品，加入以后 10 年是我们增长最快的。

宋国友: 有人说美国在俄乌战争中提供的只是军援，它几轮武器提供下来，美国制造业大概多 200 亿美元，就这么回事，这个很有意思。

王战: 我跟徐明棋在商量这个事情。我们讨论明年这轮疫情以后，德国的投资如果真的到中国来了，会有溢出效应，日本会想我该怎么做，还有澳大利亚。

夏春: 已经有一些德国企业厂到中国来。

彭文生: 德国有一个化工企业巴斯夫。明年我觉得最关键的问题，还是疫情防控，如果这个事情没有什么动作的话。

王战: 把三句话“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掉个头，统计是要统计的，不就一千多人吗，你公布干什么？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疫情恐怖症对经济造成的影响。还有“新冠肺炎”这个名称已经不对了，在武汉的时候可以叫新冠肺炎，现在跟肺有关系吗？就是一个上呼吸道感染，但是现在是按照肺炎在管理。

徐明棋: 我的解读是要总结经验，疫情三年告一段落，取得重大成绩。随着疫情形势的变化，将会有新一版的指

导，第十版的指导意见会做出相应调整，估计要等到经济工作会议和人大开完会以后，那个时候通过国务院疾控办出来。

夏春：很快要冬天了，中国好多地方还像这样每天出去排队做核酸，东北都是零下十几度，怎么搞。

徐明棋：可能会有一些局部调整，大的转变不太可能。我们讲经济讲那么多，其实还有很重要的背景，如果美国今年增长 5%，或者 4%，没有衰退，我们的压力就很大，最高领导考虑的是这个。

乔依德：我们已经排在新兴发展中国的后面了。

徐明棋：我们不考虑和新兴发展中国家比，我们是追赶美国。

彭文生：美国经济今年的名义增长比我们快很多，美元又升值这么多，中国和美国今年 GDP 的差距很大。

王战：一个案例就说明问题，当初美国是怎么把日本整死的，当时是美日同盟，美国照样把它掐死。照这样来讲，这 10 年不是唱赞歌的时候。

彭文生：我们平时跟投资者交流，太悲观了。现在金融市场的人还好一点，关键是底层老百姓的日子很难过。

宋国友：体制内受疫情的冲击比较小，真正受影响的是民营经济，在中国经济中就业占 80%，这 8 成的就业极容易受到冲击。

乔依德：好的，谢谢大家！

（以上内容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我国人口老龄化态势及养老保险政策的变化

郑秉文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上海发展沙龙第 173 期 2022 年 10 月 21 日

乔依德（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各位来宾，各位朋友，晚上好。首先跟大家表示歉意，本来我们是准备线下举行这次沙龙的，但由于疫情的变化，各项防疫措施使得郑秉文先生到场的不确定因素加大，所以我们决定还是线上举行，我们也期待能够早日跟大家线下见面。

我们这次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的郑秉文先生，他长期关注我国养老保险制度。今天，他的演讲题目是“我国人口老龄化态势以及养老保险政策的变化”。二十大正在召开，报告中也提到了社会保障体系，指出要“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实现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郑秉文先生刚好对这个题目做了准备，下面我们就请郑秉文先生给我们做演讲，大家欢迎。

郑秉文（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谢谢乔秘书长对我的邀请，本来打算去上海，

但是由于疫情的原因，临时改变了行程。非常感谢乔秘书长精心安排这个命题作文，我对这个题目稍微有点准备。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对社会保障的论述还是不少的，在简版里没有全部展示，全文版里更多一些。为了节省时间，我就不读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里关于社保改革的内容了。根据二十大报告的内容，我这里就做一个比较简短的浓缩，就主要的问题，即如何化解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制度带来的财务可持续性的冲击，做一个学习体会的发言。今天内容包括六个方面，发言大概在一个小时以内，下面我就开始分享。

- 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 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
- 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 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健全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筹资和待遇调整机制，推动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省级统筹。
- 促进多层次医疗保障有序衔接，完善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制度，落实异地就医结算，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积极发展商业医疗保险。
- 加快完善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
- 健全社保基金保值增值和安全监管体系。
- 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

图 1：党的二十大报告的相关内容

先讲第一个方面，我国人口老龄化基本态势和主要特征。人人都说老龄化，那么我国的老龄化到底有什么特征呢？我这里做了这样一个高度的浓缩，第一个特征是“发展速度快”。联合国关于老龄化社会的界定是：65岁以上的人口超过7%，叫做“老龄化社会”；65岁以上占总人口的14%，叫做“深度老龄化社会”；如果这个比例超过20%，

就是“超级老龄化社会”。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是个什么情况呢？我们迈过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7%这个坎是2000年，2021年达到了14%，我们用了21年就从老龄化走到了深度老龄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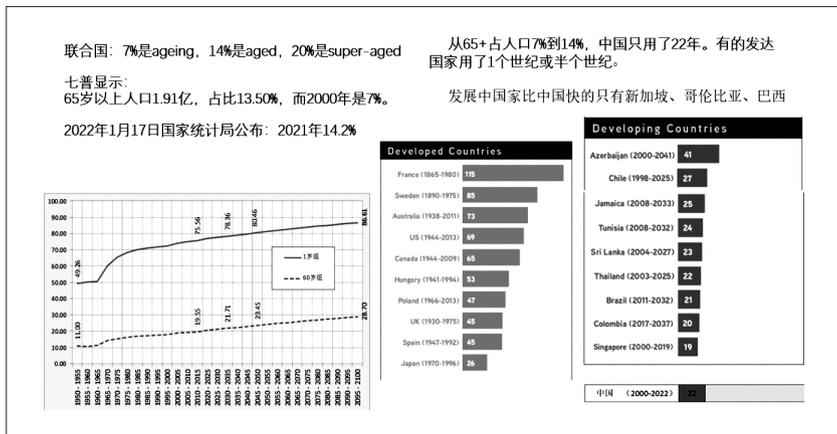


图 2：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第一个特征：发展速度快

发达国家从老龄化到深度老龄化，这个之间有多少年呢？法国是从1865年到1980年，用了115年；瑞典是从1890年开始，用了85年；澳大利亚从1938年开始，用了73年；美国是从1944年到2013年，用了69年，美国9年前刚刚跨过14%的坎；加拿大是从1944年到2009年，用了65年；日本是从1970年到1996年，用了26年；这是发达国家用的时间。

发展中国家用的时间大部分是三四十年。比中国发展速度快的国家有三个，比如新加坡用了19年，哥伦比亚用了20年，巴西用了20年。中国的速度快于所有发达国家，仅

比这三个发展中国家慢那么一两年。这是我们第一个特点。为什么速度那么快？原因需要一些实证分析，估计应该和我们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关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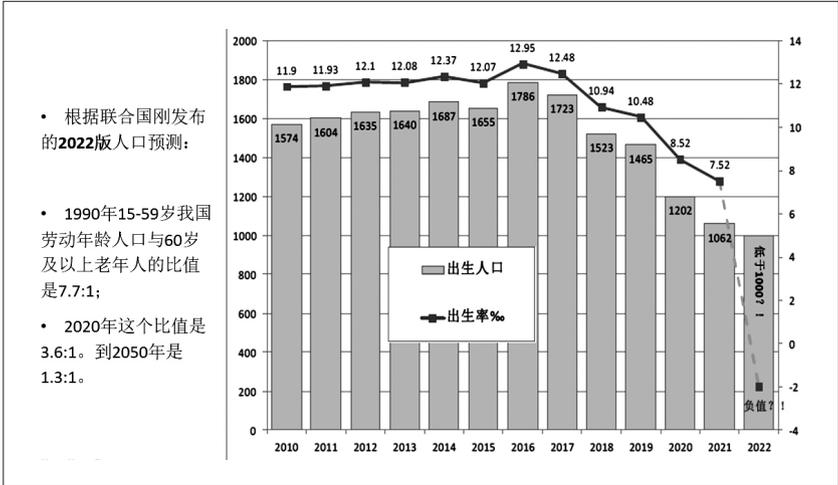


图 3：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第二个特征：出生率急剧下降

第二个特点是“出生率急剧下降”。根据联合国刚刚发布的2022版的人口预测：1990年我国15岁到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与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比值是7.7比1；到2020年，这个比值提高到3.6比1；到2050年，预计提高到1.3比1，几乎就是1比1了。老龄化重要的特征是出生率比较低，严格意义上讲，我国目前的老龄化应该叫少子老龄化。

我们可以看一下出生率的情况。2016年我国放开了二胎政策，出生率从12.07%反弹到12.95%，2017年回落到12.48%，2018年回落到10.94%，可以说下降得非常快。2021年出生率已经下降到了7.52%，低于10%了。正是在

去年，中央决定放开二胎政策。所有人都估计今年的出生人数恐怕要低于死亡人数。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么中国今年将是负增长的元年，也就是说从2022年开始，中国人口逐年减少将成为一个不可逆的趋势。这是我国人口老龄化重要特点之二。那么出生率为什么下降？报纸上有很多分析的文章，不外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的提高以及养老医疗成本的提高等，当然也有我们观念变化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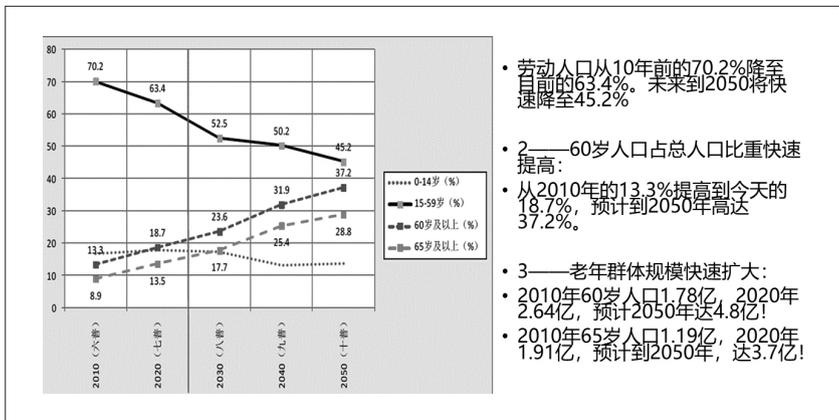


图 4：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第三个特征：赡养率快速变化

第三个特点，就是“赡养率变化特别快”。看一下7普和6普数据的比较，从2010年到2020年的十年以来，劳动人口从占总人口比例的70.2%降到了63.4%，60岁以上的人口从占总人口的13.3%提高到了18.7%，65岁以上人口从占总人口的8.9%提高到了13.5%，2021年超越了14%，达到14.2%。这些数据标志着深度老龄化的来临，一方面，老年人的占比上升；另一方面，劳动人口占比下降。

在未来的 30 年里，这两个数字将逐渐接近，2050 年第十次人口普查时，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会达到 37%，65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会达到 28%，就业人口将只占 45%。看了这组数据，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中央提出要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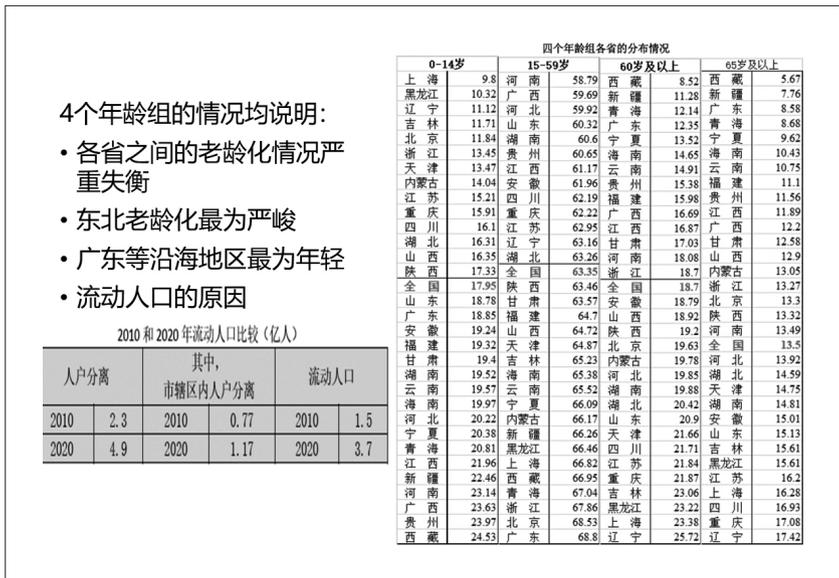


图 5：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第四个特征：空间分布严重失衡

第四个特征，是老龄化的“空间分布严重失衡”。在 30 多个省之间，我们用 4 个年龄组的情况来说明，分别是 0 岁到 14 岁组，15 到 59 岁组，60 岁以上组以及 65 岁以上组。观察这四组的年龄，我们都会发现，大约四分之一、三分之一强的省份高于全国平均数。除上海以外的沿海地区好于非沿海地区。上海、辽宁的老龄化情况非常严峻。上海的情况

有点特殊，既是重工业基地，又是沿海省份，上海在这方面贡献太大了。

沿海地区吸纳了全国几乎所有的流动人口，而流出地几乎都是中部和西部。这样会产生什么结果？研究社保、养老的专家立马就有一个反应，流入地的流入人口是青年人，稀释了流入地本来十分严峻的老龄化情况。流出地本来是均衡的，但是年轻人到发达地区打工，留下了老人和小孩，导致留守老人、留守儿童居多，提高了当地的人口赡养率，赡养人少了，被赡养人却多了，这就导致人口发展急剧失衡。

对企业来讲，在发达地区，由于年轻人多，老年人占比就被稀释了。所以在发达地区，企业缴费和工业缴费比例都低，因此就想办法把基数做得很小，甚至明目张胆地把费率做得很低，有的省从来没有按照国家统一规定的费率缴费。在没有投入的情况下，这些钱放在银行里吃活期利息，是低于CPI的，是贬值的。所以，收的越多，贬值越多，收的越多意味着企业的负担越大。这些地区为了吸引企业，就降低社保缴费比例，就形成了发达地区越来越发达，不发达地区越来越不发达的情况。不发达地区的企业和青年人都跑到了发达地区，发达地区越来越汇集了企业和青年人。比如广东省，广东拥有全国流动人口的四分之一，在沿海发达地区中，它是人口最年轻、老年人最少的地方。这是人口变化的第四个特征。

下面分享第二个问题，养老保险政策的变化。

首先，老龄化严重影响了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性。2020

年 12 月，根据中央对养老保险抚养比的官方公布：养老保险抚养比将从 2019 年的 2.65:1，下降到 2050 年的 1.03:1。2019 年首次出现收不抵支，2036 年基金枯竭。

根据 2019 年我们在上海发布的《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 2019-2050》的结果，2019 年养老保险抚养比是 2.13 比 1，到 2050 年我们是预测 1.04 比 1，预测 2018 年首次出现收不抵支，这比官方公布的 2019 提前一年，2034 年基金枯竭，也比官方预测提前了一年。我们的预测数据和中央十分接近，不管是谁预测，结果大同小异，这种趋势性的结果是没有办法的，相差的只是小数点后面一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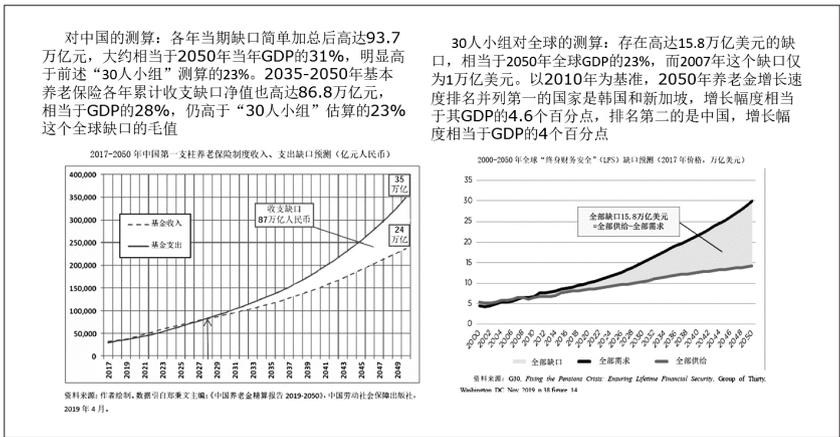


图 6：养老金保险收支将持续出现缺口

其次，养老保险收支将持续出现收不抵支。图 6 左侧的红线表示支出，蓝色虚线是收入。2028 年之前蓝线在上面，收入高于支出；2028 年以后，红线上去了，支出比收入高且每一年缺口增加；到 2050 年，各年收支缺口加总的结果是

87 万亿人民币，相当于 2050 年 GDP 的 28%。根据 30 人小组对全球的测算，未来养老金的缺口是 15.8 万亿美元，相当于 2050 年全球 GDP 的 23%。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养老保险收支缺口比发达国家要严峻。

全世界在老龄化面前，所有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都将面临两个时点，或早或晚都要来临。一个时点是当期的收入和支出出现逆转。以前是收大于支，每年还能有点余额，一旦逆转，每年开始出现缺口，就得从以前的余额里面往外拿，每年都拿一点。于是第二个时点不久也会来临了，最终基金的余额枯竭。这就是现收现付制的两个时点，在所有的国家都将不可避免。问题是你怎么应对，应对以后能够延迟多长时间。

- (一) 中央及时跟进调整人口政策
- (二)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
- (三) 职工保和居民保的基金进行委托投资
- (四) 国有资本划转充实全国社保
- (五) 建立中央调剂金制度
- (六) 实施省级统筹
- (七) 实现全国统筹
- (八) 十四五期间实施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图 7：党的十八大以来养老保险应对老龄化的改革
第三，党的十八大以来养老保险应对老龄化的改革。这

里，我高度浓缩了 8 个改革方案，前 7 个已经实施了，第 8 个“十四五期间实施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将要实施。

先谈第一个改革，就是“中央及时跟进调整人口政策”。从 2013 年单独两孩，到 2015 年全面两孩，再到 2021 年 5 月 31 号的三孩政策。

第二个改革是“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金制度改革就启动了。2015 年 1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正式决定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个人 8% 进入个账，单位 20% 进入社会统筹。从制度设计的角度来看，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制度基本上与企业部门一致起来了。从制度运行的角度来看，恐怕以后将受到一些挑战，比如当地方一般公共预算的收入受到约束时，这个制度可能出现一些问题，这里就不细说了。机关事业单位的改革非常复杂，这也是需要我们长期关注的。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制度改革使全国碎片化的社保制度有了这样一个基本的一致。以前，城镇是两个制度，现在城镇是一个大制度。以前机关事业单位是公费养老金，现在不是了，现在全国只保留了两大板块，就是城镇板块和城乡板块这两个大制度。

第三个改革是“职工保和居民保的基金进行委托投资”。这是一个重要的事件，是一个改革的结点。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基金越来越多。我在 2009 年写了一份内参，2010 年启动这项改革，后来经过一些波折，延到 2015 年实施。

这项改革，我们也是做了一些贡献的。这项改革的意义是深远的，如果不投资，采用银行静态活期存款或协议存款，与投资的结果相比，会相差六七个点，也就是说投资以后效果更好。2020年10.95%，2019年9.02%，2018年2.56%，2017年5.23%。4年平均6.94%。同时也存在问题，目前1.5万亿受托投资，还有3.8亿沉淀在各地，即三分之二还在地方银行里。这就涉及到了路径依赖，如果把这些资金集中起来投资，有些地方性股份制银行会面临存贷比的极大降低，有的银行恐怕就要挺不住了。所以长时间下来，改革的成本很高。“城乡居保”的资金，当期的收入也开始投资了。“城乡居保”养老金支出的资金不是来自当期的缴费，而是来自财政转移支付，当期的缴费全都沉淀在银行里了。从2018年、2019年开始，对当期的增量收入进行投资。投资是一个大事，也是我今天着重想要发挥的地方。

第四个改革是国有资本划转充实全国社保。2017年开始张罗划转，2019年1月宣布共划转93家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机构国有资本总额1.68万亿元。目前，地方层面基本已经完成国资划转，大约1.6万亿元，与中央合计为3.3万亿元。我大体测算，2021年中央层面划转的国有资本分红大约200亿元左右；地方层面，最多的浙江、江苏等省每省能有5亿，最少的有几千万，全国合计大约50亿元。200亿够发养老金不到一个礼拜，也就是说，张罗十几年的国有资本划转，最终的结果是每年的增量也就不到一个礼拜的养老金，这离我们想象的结果差距太远了。我今年写的提案内

容是，提高比例，另外要把集团股办成上市股，集团股是没有流动性的。这条是一个创新，但也是杯水车薪。

第五个改革是建立中央调剂制度。2018年7月1号开始实施中央调剂制度，由于发达地区的养老金越来越多，沉淀的规模越来越大，广东省一个省的沉淀是全国的五分之一，沿海地区加在一起是全国沉淀的三分之二。所以在欠发达地区，养老金不够发，得靠中央转移支付，而发达地区的养老金又剩这么多，不能进行横向调剂。最后中央建立了一个调剂制度，调剂的效果特别好。2018年建立中央调剂制度时，调剂比例为3.0%，基金调剂规模2422亿元。此后每年略有提高：2019年调剂比例和基金调剂规模为3.5%和6303亿元，2020年分别为4.0%和7400亿元，2021年调剂比例为4.5%，调剂规模近9000亿元。建立中央调剂制度4年来，调剂总规模超过2.5万亿元，其中跨省调剂资金总计6000多亿元。这个举措缓解了各级财政压力，没有增加养老金在收入端的缴费。实施中央调剂以后，财政支出从2017年的8004亿立马下降到了2018年的5000多亿，从财政支出占当年支出的21%下降到12%。

第六，实施省级统筹。省级统筹经历了艰难的等待，从1986年养老保险开始试点，一直到2017年动真格的，30多年来省级统筹没有实现。最后在2020年才完成了省级统筹。省级统筹是比较货真价实的，统筹的是当年的缴费收入，历年的滚存结余没有动。

第七，实现全国统筹。2022年1月1号宣布实现全国

统筹。省级统筹，统筹的是当期的，各县市全部集中到省里，县市没有钱了。全国统筹不是这样的，当期的收入没有收到全国来。这个统筹建立的是全国调剂制度，相当于刚才说的中央调剂制度的升级版。在中央调剂制度下，每年 7-8 个收入多的省份要给那 7-8 个有亏空的省份进行转移支付。今年 1 月 1 号实行全国统筹之后，转移支付，往外支付的省份扩大到了 13-14 个，支持那 7-8 个收不抵支的省份，调剂的只是当期的缺口，对缺口的资金进行了全国调剂。全国统筹是一个动态长期的过程。首先要过渡到当期缴费收入，然后再把各省沉淀的资金也统筹上来，所以估计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实现真正的全国统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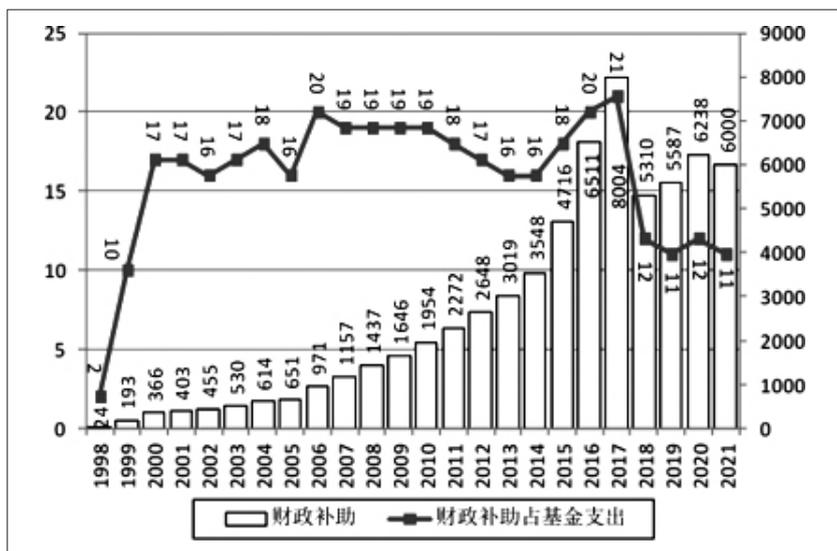


图 8：1998-2021 年养老保险财政补助变化及其占基金支出比例变化

最后，十四五规划中提出要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中国的退休年龄分三个档次，女工是 50 岁，女干 55 岁，男干 60 岁，一直就是这个制度。延迟退休年龄的做法在发达国家比比皆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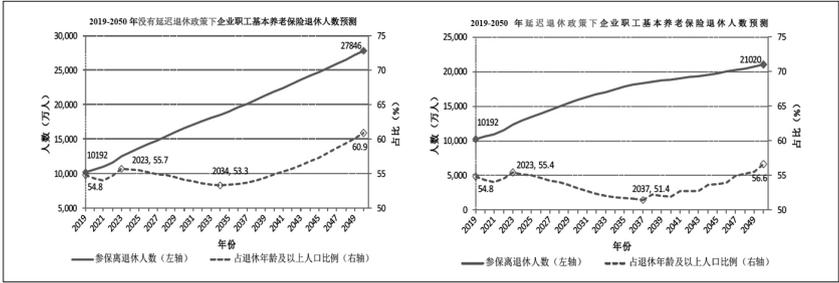


图 9：有无延迟退休政策下的退休人数对比

图 9 的左侧是没有延迟的，右侧图是有延迟的，对比一下对养老保险制度的影响。到 2050 年的时候，如果没有延迟，参保离退休人数是 2.78 亿；如果延迟，降到 2.1 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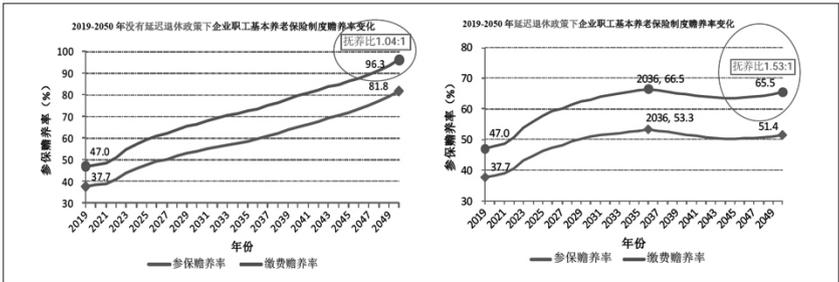


图 10：有无延迟退休政策下的赡养率变化

图 10 中，如果不延迟，抚养比是 1.04 比 1，相当于 100 个人养活 96 个人，赡养率是抚养比的倒数。如果延迟，抚养比就会改善到 1.53 个人养活一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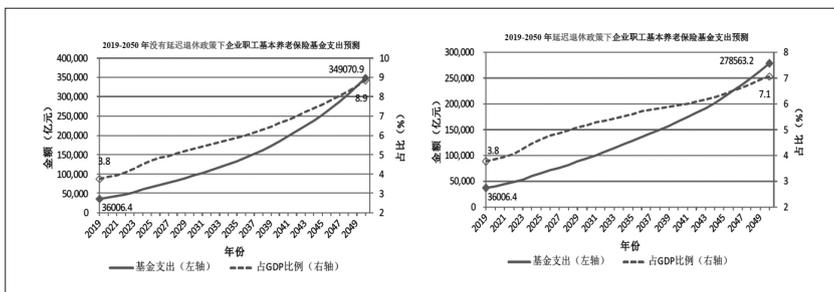


图 11：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预测

延迟对支出的影响是最大的，比对收入的影响还大。不延迟的话，2050年的养老金支出是35万亿，延迟的话是28万亿，差7万亿，从2050年占GDP的8.9%降到了7.1%，将近两个百分点，对支出的影响非常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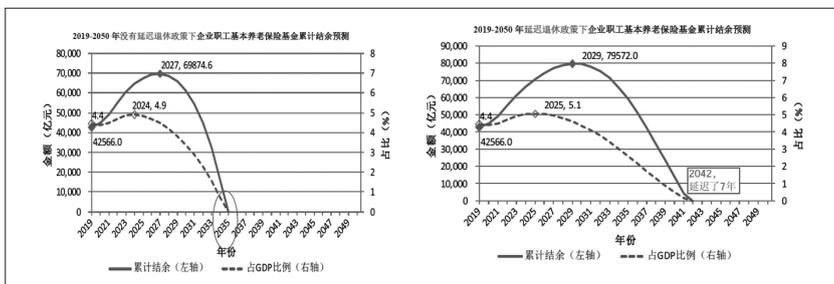


图 12：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预测

延迟对收入的影响实际上不大。对基金余额的影响，不延迟的情况下2027年的当期收入是峰值，2028年首次收不抵支，2035年将基金枯竭；要是延迟，2029年是峰值，收不抵支会推迟到2030年，枯竭时点推迟到2042年。从2035年推迟到2042年，延迟了7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延迟退休年龄。

第四，中央近年来多支柱养老保险改革政策解析。

近一两年来中央密集发布了养老保险改革政策。第一个点是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第二个点是集中建立第二支柱、第三支柱，发展多支柱养老保障体系。总书记在 20 大报告中的用语，也是“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这两个点，一是夯实社会财富储备，二是建立第二、三支柱多层次体系。这两个点说的是一件事，即如何用物质财富来应对人口老龄化。我们要积累社会财富，积累的不是大米白面，而是金融资产。体现在养老的核心金融资产是什么呢？是养老金。在发达国家，第一支柱都是现收现付，养老金主要在第二第三支柱上。中国的第二、第三支柱很小，覆盖人数只有 2800 万人。第三支柱，2018 年试点了，才 4 万人。今年又发了《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7 号文），更新 2018 年的试点，想大力发展第二、第三支柱。

特征	资产型制度				负债型制度			
	支柱一	支柱二	支柱三	代表	支柱一	支柱二	支柱三	代表
体系结构	成熟	发达	发达	美国	成熟	不发达	不发达或没有	德国
制度属性	DB	DC 型信托制	账户制	加拿大	DB	DB 或没有	契约制或没有	法国
资产规模	占 GDP 很高，甚至超过 100%			荷兰	占 GDP 很低			意大利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图 13：资产型与负债型养老金体系的主要特征及其区别

根据国际惯例和最佳国际实践，只有第二、第三支柱是财富型的，是资产型的，大部分国家的第一支柱是负债型的。也就是说，发展第二、第三支柱多层次体系，与夯实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财富是同一件事的两个侧面。第二第三支柱是积累社会财富储备的载体。那么根据中央的文件精

神，就应该实行这样两个转变，即养老保险体系在人口红利消失的情况下，要向资本红利转变，负债型的制度要向资产型的制度转变。

当人口红利没有了，生的小孩越来越少，老年人退休越来越多，寿命越来越长时，用什么来支付养老金的缺口呢？延迟退休年龄等这些措施都是有极限的。没有极限的是资本红利，即让钱生钱，用复利的奇迹来支撑未来的人口老龄化。红利的这种变通，就是实现两个转变，实现两个转变的时机已经来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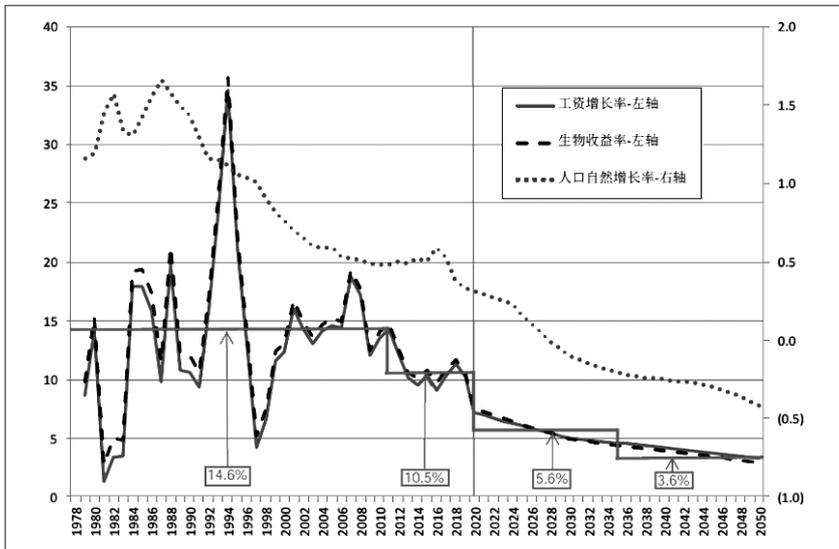


图 14: 1979-2050 年中国生物收益率下降趋势

此前，我们的生物收益率很高。生物收益率是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率加上人口自然增长率，这两率加在一起在中国非常高，过去的十几年里是 14.6%。从 2010 年到 2020 年下降

到 10.5%。未来的 15 年，大家攒钱的欲望，买房的欲望会下降很多，可以把钱放到养老金的帐户里，否则要面临很大的损失。过去十几年，生物收益率将近 15%，投资回报率如果没有达到 15%，福利是下降的，老百姓说就是贬值的。但是什么投资能达到 15% 呢？只有买房。所以过去十几年房子最赚钱，大家都买房子，于是就限购了。生物收益率下降，是因为人口出生率下降，工资增长率也下降。工资增长率下降是因为 GDP 增速下降，导致生物收益率下降到 5.6%。这时候，你的养老金帐户 6%-7% 的收益率就高于生物收益率了，就划得来了。这个条件就具备了，就愿意在帐户里放钱了。以前帐户是建不起来的，建立起来也不愿意放钱，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统帐结合的，可是帐户是空的。我们上海 2005 年拿了 50 亿，2006 年拿了 50 亿，就那两年个人帐户拿了 100 亿，再也不拿了。一共 13 个省试点，没有省拿的，因为拿这么多钱静悄悄放在养老金帐户里，太划不来了。用学术语言说，艾伦条件不具备，低于生物收益率，这就是为什么以前我们抢房子的原因。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未来大家不抢房子，甚至房价逐渐下降的原因，是和人口老龄化是有关系的。

第五，第一支柱基本养老金的改革方向。

实现两个转变。一定要有初始资本，钱的问题要解决。美国的做法是很快提高缴费率，然后把缴费率固定在 9.9%，加拿大也是 9.9%，中国是 24%。美国一直是不动的，加拿大也是不动的。加拿大到 2100 年本世纪末，无论人口老龄

化到什么程度，社保费保持 9.9% 不变。在不变的情况下，加拿大的基金余额从以前只能支付 1.9 年，提高到两年，三年，四年，五年，从 2025 年起加拿大每年都收不抵支，但是基金余额越来越多，这就是复利奇迹的结果，用资本红利代替人口红利。加拿大 1997 年改革的时候，只可以支付两年，2000 年可以支付 5 年。美国 1990 年改革时，只够支付半年，现在它的积累可以支付 2 年半。日本 2001 年改革时，只能支付不到 12 个月，现在可以支付 4 年。韩国 1998 年时可以支付 1 年，现在可以支付 4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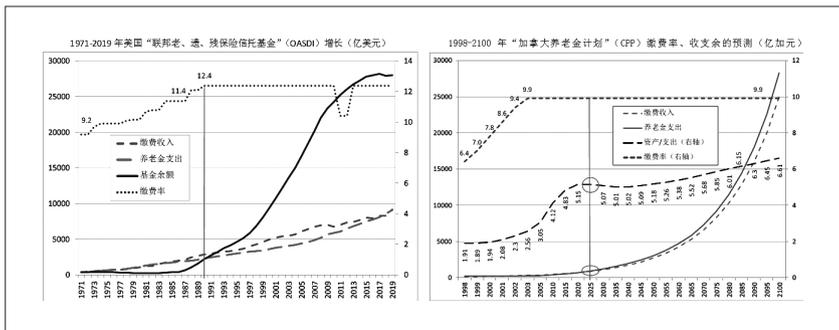


图 15: 美国和加拿大的眼养老金收支情况

中国基本养老金最牛的时候，可以支付 14 个月。我国 2021 年底第一支柱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仅够支付 0.9 年，占 GDP 的 5%，规模太小，其投资收益必然也小，红利作用不大，并且，目前 5.3 万亿职工养老保险基金中只有 1.5 万亿实施了投资。本钱少，规模少，投资回报的绝对数就少，这就填不满未来老龄化形成的收支缺口，就这么简单。

国外为什么可以呢？因为国外很快提高缴费水平，他们对纪律的遵从度是高的，不这么做是要坐牢的，这是法律环境。我们没有这个条件，只能靠吸引力，我们现在连城乡居民保险都不说强制性的，是自愿参加的，城镇职工制度也没有说是强制的，你不参加也不违法。雇主不参加是不行的，但老百姓不参加，职工不参加，没有违法。

第六，发展第二和第三支柱的困难与前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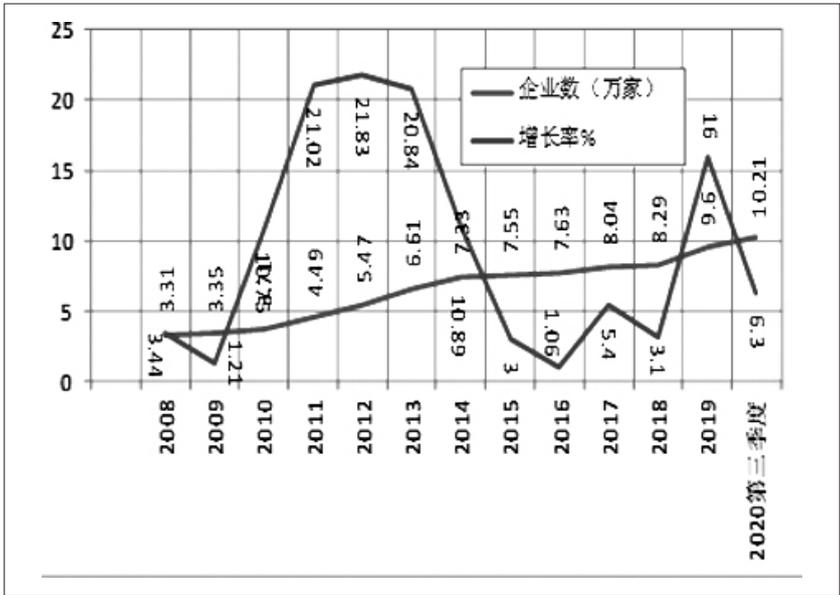


图 16：全国设立年金的企业

我们第二支柱的困境在于，初始资本怎么来？初始资本实际上可以靠制度来解决。我们企业年金覆盖率的扩大陷入了瓶颈。到 2021 年末，全国设立年金的企业 11.75 万户，仅占全部 4842 万户企业的 0.24%；参保职工 2875 万人，仅

占全国 4.8 亿职工的 6.0%。第二支柱的覆盖率太低了，应该扩大覆盖面。2004 年建立了企业年金，这个制度实施到现在已经很多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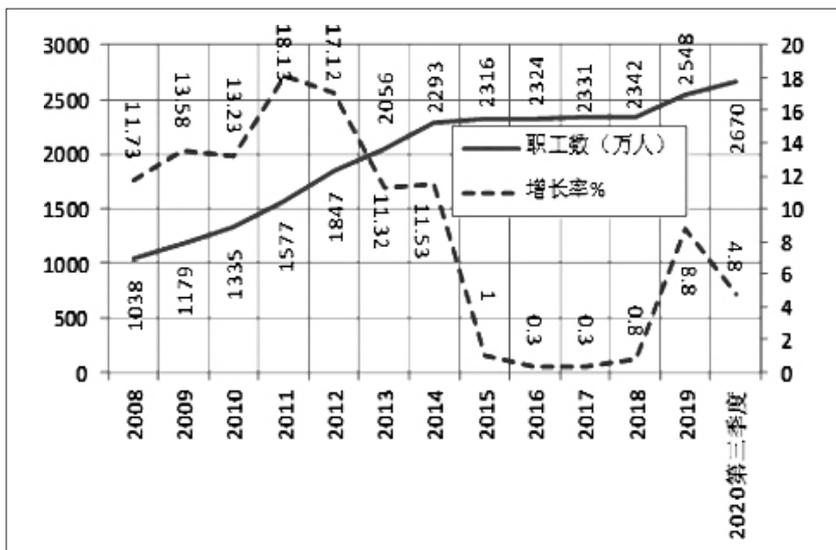


图 17：全国参保年金的职工

第三支柱也面临着覆盖面的困境。第三支柱发端于 2018 年 5 月 1 号的试点，试点到现在，参保人数 5 万多人，收入才 4 亿人民币，很少很少的。这个制度经过了 11 年，终于在 2018 年试点了，试点的结果就是现在的数据。为了改善这个情况，中央去年年底 12 月份开会，通过了新的制度。今年 4 月出台 7 号文，正式启动第二轮的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制度。在中国，第三支柱叫个人养老金。每个国家的叫法不一样，美国叫 IRA（个人退休帐户）。第三支柱的主要特点是：第一，有缴费上限，中国是一年 12000；第二，

是 EET 型，即在你交钱时，个税是免除的，在退休时需要补交延迟的个税。上个月国务院常务会决定，个税从 2018 年试点的 7.5%，降到 3.0%。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2018 年试点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产品，7 号文公布的个人养老金包括了保险产品，也包括了储蓄产品、银行理财产品，更主要的是包括了公募基金，以前只有一个产品，现在有四个产品，几乎覆盖全了。这一升级的版本是和国际接轨的，这又是一个特点。

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在国际上是有争议的。第三支柱的建立是谁张罗的呢？是 1994 年世界银行张罗起来的，当时出了一本书《避免危机：保护老人及推动发展的政策》，这本书推荐给各国政府，一下子就掀起了改革的浪潮。它把养老分成第一、第二、第三支柱，第一支柱是指国家主办的基本养老保险，第二支柱是指企业主举办的企业年金制度，第三支柱是指个人进行的个人养老金制度，它认为个人养老金制度应该大力发展，于是就把全世界的政府都卷入进来了，都在讨论按照三支柱来衡量自己。有的国家只有国家主办的第一支柱，没有企业主的企业年金，所以很多国家就开始张罗。

在 1994 年世界银行提出三支柱理论之前，绝大部分国家没有第三支柱，世界上只有三个国家有第三支柱：加拿大是 1957 年建立的，瑞士是 1972 年建立的，美国是 1974 年建立的。世界银行提出来之后，在 1998-1999 年，西欧、东欧、中欧这些转型国家和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开始建立，

到现在 24 年了。有的国家是本世纪初建立的。中国是 2004 年建立的第二支柱。现在转型国家和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有了第三支柱。我今天单独把第三支柱拿出来，因为刚刚发布第三支柱这个政策，正热的时候，要给大家讲一讲。

世界银行提出第三支柱后就产生争论了。第三支柱到底是补充性的，还是发挥重要作用的？国际组织的看法就不一样了，世界银行是把它看成补充性的、少数人的制度，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也是这样认为的。但国际劳工组织就骂大街了，认为第三支柱不应该建立，第二支柱也不应该建立，这两个支柱都是投资型了，让工人承担了市场的风险（经常冒着股市大跌的风险）。国际劳工组织说这是不对的，世界银行是错的，不应该鼓励各国建立第二第三支柱，一个国家只要零支柱和第一支柱就好了。零支柱是指财政转移支付的养老津贴，第一支柱是国家主办的强制性基本保险制度。所以国际劳工组织走上了一个极端。欧盟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大力提倡发展第三支柱。因为欧盟国家的养老金替代率在下降，大部分国家都是下降的，下降幅度最大的有 45%，最小也有 1%。欧盟说个人养老金是跨雇主、跨行业的制度，人人都可以参与。你没有雇主也可以参加，保姆也可以有，家庭教师也可以有，你个人建立就可以了。不像企业年金，得有雇主、单位给你建立。所以欧盟对这个事特别热心。

个人养老金在中国的定位，我认为只能是欧盟提的，是多数人的制度，不应该是少数人的制度。2018 年 5 月试点

的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全国只有四万人参与，是塔尖的塔尖。这个制度最终要被大家遗忘，束之高阁的，或者成为少数金融从业人员的一个特权。你想买吗？它也不卖，因为卖一个亏一个，卖给自己不怕亏啊。再比如，八年前我们建立的税优型健康保险，也是商业保险，你能买到吗？你也买不到，保险公司不上架，卖一个亏一个，为了完成任务都是保险公司内部消化了。所以我们建立这个第三支柱，必须是多数人的制度，是一个大众型、普及型的制度。如果把它变成一个皇冠上的明珠，只有少数人能够享受到，这个制度就失败了。既然这个制度的参与规模大，那么三支柱加一起，就不应该是金字塔型的，而应该是哑铃型的。好多国家的第三支柱是大于第二支柱的，加拿大就是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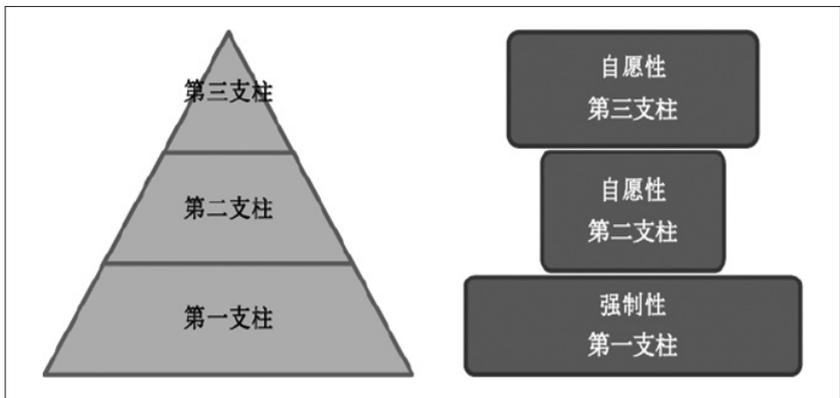


图 18: 金字塔型与哑铃型三支柱养老体系比较

第六，这是我今天说的核心问题，多层次或者二三支柱为什么这么难？2018年5月份的试点不太成功，政协很多次调研，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地方也是说实话的。原因有

很多，手续繁杂啊，那时候还没有综合所得税等。实际上最要命的是两个税制的问题。第一，凡是第二三支柱做得比较好的发达国家都是 EET 型的，每个月交钱的时候不纳税，中间投资不纳税，最后领取的时候才纳税，所有国家都这样，我们建立的制度也是这样的。但是安装中国的税制，你得挣多少钱才能享受免税呢？我算了一下，年收入得在 16-17 万以上才能享受免税。以北京为例，有一个人，一个月 13000。按照北京的政策，他交了五险，交了一金，再交了起征点，再减去 6 项专项扣除，他最后的应纳税所得是负数，就是不用上税。在不用上税的情况下，建立第二三支柱，有什么便宜占呢？没有便宜占啊，它没有享受到税收优惠政策，为什么要参与进来呢？所以年收入 16-17 万的人参与第三二支柱，就占不到便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人愿意参加。本来中国就没有纳税人。我们纳税人最多的时候是两亿多，前年我们起征点从 3500 提升到 5000，一下子又掉下来 5 千万人，本来纳税人就很少了。美国有一半是纳税人，美国 3.2 亿，1.6 亿是纳税人，中国的纳税人只占人口的 5%，这差距太大了。在纳税人里，你必须得每个月收入 14000-15000 以上，才能享受到所谓的第二三支柱税延的优惠，显然这个群体就更少了。你即使建立了，每个月节省的也就是一两百块税钱，延了一两百块钱，激励性也不大，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税制的问题，是资本所得税缺位，资本所得税就是证券交易的税。证券交易的收入我们是免税的，发达国家

都是征税的。中国的养老金是免税的，发达国家的养老金是征税的，你上班时候挣的工资和退休时候拿的养老金都得上缴个人所得税。EET这种第二三支柱制度，之所以在中国发展不起来，是因为你炒股票、买基金获得的收入是不上税的。水位是平的，水怎么流动呢？100万亿怎么从银行搬家到养老金帐户里呢？那不可能。这就是中国税制的又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导致中国的债务资金非常多。中国是一个债务债权资金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我们的经济就是这样的一个体系。所以企业过几年要债转股一把，我们的股权资金很少。这就是第二三支柱难以发展起来的两个根本上的税制原因。当然，还有一些原因，我这里就不说了。

这就是我今天讲的所有的内容。总结起来，中国养老金改革的方式、路径，要实现两个转变，即从人口红利向资本红利转变，从负债型的支柱向资产型的支柱转变。转变的过程中有一些困难，这些困难需要我们群策群力，不能有部门利益。如果有部门利益，改革是不会成功的，可以说越往后，部门利益越明显，改革越难，协调越难，这是改革中最主要的敌人。我们参与了一些改革政策的制订，这就是一个亲身的体会。好，谢谢大家。

乔依德：非常感谢郑秉文先生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全面，也非常有权威的演讲。他比较详细地阐述了当前我们国家所面临的人口老龄化态势，又讲了最近几年在养老保险方面的一些改革措施，以及面临的困难和前景，非常感谢。下面我们还是有一些时间允许大家提问。大家有什么问题，

打开音频就可以提问了。左院长，你可以先提一个问题吧。

左学金：首先感谢郑老师。郑老师对我们国家人口变动和养老金改革的历程，做了详细的系统的阐述，提供了宝贵的数据。郑老师的观点我都是非常赞成的，但是我在某种意义上，对中国养老金的未来比较悲观。刚才郑老师用很多数据来说明养老金二三支柱体系建不起来。我感觉这里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第一支柱的缴费率太高了，现在已经降下来了，是16+8，广东浙江可能还低一点，不到16，但是普遍是16+8，总共是24。美国是6.2+6.2，总共是12.4，我们大概是人家的两倍。我们就业人员2021年已经7亿5千万，只有不到一半的人缴纳养老保险。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我们国家很多问题都解决不了，但是这个问题解决很难，我们中央能不能下决心做这个，把第一支柱缴费率降下来？

第二个问题很简单，中国人口老龄化，我们的劳动人数越来越少，如果未来继续靠工资来筹集养老金，肯定没有出路。今后要逐步增加一些一般税来筹集养老金，当然也很难了。到2035年钱就用完了，这是未来很大的问题。我感觉，这些问题是比较根本的问题，三个支柱的改革都解决不了。

郑秉文：左院长是这方面的专家，你发表的重要的文章，我也都拜读了。关于第一个问题，费率高导致覆盖率下降，变成政治问题了。刚才说的一条非常对，各国社保进行改革时，如果有不当的政治操作，都会引发社会动荡。我们国家没有引发什么动荡。费率、覆盖率、赡养率是一个函数

关系，收入在减少，你保持费率不变，怎么可能？必须要有介入，财政介入现在现实吗？据说上半年，全国没有多少省是有盈余的，有些地方听说公务员工资都推迟了。所以，第一支柱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率下降是趋势，因为收入端减少了，以后能不能再降低，我觉得难。企业负担高，第二第三支柱的缴费空间也减少了，第二第三支柱没有发展起来。

第二，生育率是规律性的，在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之后，生育下降有一个不可逆的趋势。生育率高的国家，生活水平肯定是不高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中国恐怕以后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发达国家面临的问题，中国都要一个不落地经过一遍，所以要提前看看人家怎么克服的。

吴信如：刚才郑老师讲的非常好，学到很多东西。我有一个问题，提高退休年龄是否会提高失业率？第二个问题，外汇储备能否用在养老基金上？

郑秉文：提高年龄是否会提高失业率，很多人都这么问，但是实证研究中没有碰到过这样的先例。恰恰相反，退休年龄高的国家，失业率是低的。美国是全世界退休年龄最高的国家之一，今年美国的退休年龄是66岁零6个月，明年是66岁零8个月，每年增加两个月。美国的失业率是最低的。那么希腊的退休年龄，男的是60岁，女的是55岁，可是希腊的失业率向来都是最高的。所以从实证研究来看，退休年龄高的，没有发现失业率必然就高，可能恰恰相反。主要还是看这个国家经济制度、经济政策。西欧常年的失业水平是7%-8%左右，美国是4.5%-5.5%，西欧长期比美国

高，西欧的退休年龄大致差不多的，所以退休年龄跟失业率没有相关性。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关于外储和养老基金的关系，从全世界来看，有些国家确实把出口的外汇或者某种资源的收入划为特殊收入，建立养老基金。智利通过特殊资源的收入，建立了一个补充养老基金。最牛的是挪威，有 1 万亿的补充养老基金，挪威每个人可分到有 21 万美元的补充养老基金。我写过东西，也写过内参，我们还是因为国情嘛，我的心情跟你是一样的。2005 年朱熔基总理给我们建立一套机制，启动时是 500 亿人民币，现在是 2.6 万亿，否则我们现在就没有全国社保基金了。有一些大的天灾人祸也是可以受益的，疫情的时候动用过，2008 年汶川地震的特殊时候动过。

乔依德：还有谁有问题吗？没有问题，我提一个问题。有文章说改革 40 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养老保险没有从一开始就搞全国统筹，这是一个最大的错误。我个人是倾向同意的。从解放以后一直下来，以前的老职工作出了很多贡献，但当时他们的收入很低，是否在养老金上需要给予财政补助，这里面的含义是什么？还有国资划转太少的问题，也想听听你的意见。

郑秉文：这个问题是有争议的。我们从大社保的概念来看，我们每年得到的财政支付是 2 万亿，城镇和农村两个养老保险制度应该有八九千亿了，高点是 1 万亿。国外的养老保险制度是没有转移支付的。美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 1935 年大萧条之后建立的，到现在一个转移支付的美元

也没有。加拿大的制度是 1966 年建立的，到现在一个加元也没有。就养老保险制度来讲，医疗保险制度来讲，各个国家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保险制度讲究的是收和支的平衡，因为它是社会保险，不平衡的时候要调整参数。保险制度里面不健康的时候，必须得每年输血，像一个人一样，必须得做透析，不做透析就不行了，隔一天就透析一把，多隔一天都不行。我们现在就是这样。为什么人家美国都快 100 年的制度，一个美元的财政支付都没有，你才建立 30 多年，就离不开了呢？说明你的制度不健康。于是我们有限的财政资源就花在这些方面，削弱了我政能够集中力量花的那些地方。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特殊的国情。我们的大学基本上都是公办的，都是财政花钱。可是有些国家不是这样的，于是节省了财政很多钱。我们的医院也是公立医院，也都是财政办的，于是我们有宇宙最大的医院，反正你国家最后给我掏钱。这样财政有限的钱就不能花在应该花的地方。我们公职人员的工资水平低跟这些都有关系，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所以这里我再次说，养老保险在国外是没有转移支付的，它本身应该是健康的。德国是这个制度的鼻祖，1889 年到现在，除了头 10 年有财政补助，头 10 年是积累制，1889 年以后就是现收现付制度，没有一个马克进到这个制度里面，120 多年了。

我觉得是这一个观念问题。我作为一个专业人士专门研究这个，我再次传播我的理念：保险制度一定要收支平衡，健康，省下财政的钱，才能集中优势兵力建立别的制度，否

则的话，保险制度又不像保险，福利制度又不像福利，有限的资源被分散了。这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对于国资划转，我也同意目前的国资划转是杯水车薪。简直开玩笑，搞了 10 来年了，一年 200 亿，只能发那么几天的养老金。从研究上讲，十来年这么一个结果，没什么好说的。国有企业应该划转，起码有利于治理结构的改善。不能水泼不进，针插不进，不能连财政部门去谈国资划转都谈不上，这就成了国家利益变成部门利益了，怎么实现国有资产的委托代理制？怎么实现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你是代人民理财的，结果人民什么都不知道，保姆变成了主人。我觉得国资划转应该提高，起码可以改善治理结构。谢谢。

乔依德：好的，时间也不早了，周五晚上辛苦大家来听郑老师的演讲，我想大家收获一定很多，也给我们很多启示。以后对这个问题，我们还要持续关心关注，这也涉及到大家的切身利益。在此向郑老师的精采演讲表示感谢，今天沙龙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以上内容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